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Andrew Linklater 理論中
歷史社會學面向之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Andrew Linklater's The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指導教授：陳牧民 Mu-Min Chen
研究生：夏 耘 Yun Hsia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題目： Andrew Linklater 理論中歷史社會學面向之初探

姓名： 夏耘

學號： 7098022011

經 口 試 通 過 特 此 證 明

論文指導教授

陳淑昆

論文考試委員

陳淑昆

林煒向

翁森吾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7 日

摘要

Andrew Linklater 的理論從「人與公民」的分野出發，其宗旨在建構一個以人類解放為依歸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在理論的建構過程中，Linklater 應用了不同於主流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與主流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相較，Linklater 特別強調理念要素，並以理念與制度的改變與衝突作為人類歷史朝愈來愈自由的方向發展之動力來源，其稱之為「批判歷史社會學」。本文目的如下：第一，釐清歷史社會學面向在 Linklater 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第二，比較批判歷史社會學分析與主流歷史社會學的異同；最後，由 Linklater 架構出來的包含規範、社會學與實踐分析之研究架構，深入其研究的兩個重要主題：政治社群的轉型與傷害協議，以歸納出批判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與不足之處。

關鍵詞：Andrew Linklater、批判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

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drew Linklater's theory is the distinction of men and citizens. His purpose i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which aims to achieve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theory, he applied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 stream. Linklater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dea factors and regarded the change and conflict betwee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 power source which promote the human history developing into higher degree of freedom. He calls it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Hence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 first,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and lo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Linklater's theory; second, to compare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with the main stream; finally, through study the two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of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harm conventions, to conclude the contributions and inadequacies of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Key Words: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10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0
一、中文部分.....	10
二、英文部分.....	1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15
一、研究方法.....	15
二、研究架構.....	16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6
第二章 理論概述－Linklater 的歷史社會學.....	17
第一節 重建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	18
第二節 擁抱國際關係批判論.....	28
第三節 研究架構的提出.....	37
第四節 Linklater 與歷史社會學的關係.....	42
小結.....	44
第三章 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	45
第一節 簡介歷史社會學.....	46
一、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46
二、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多元方法與研究標的.....	49
第二節 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發展.....	51
一、社會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的國家論戰.....	51

二、關於國家能動力的雙層分析架構	53
第三節 初步比較分析.....	57
小結.....	59
第四章 案例研究－社群與傷害.....	61
第一節 政治社群的轉型.....	62
一、政治社群的意涵.....	62
二、政治社群轉型的契機：全球化	65
三、比較 Linklater 與 Habermas 對於全球化的觀點.....	67
第二節 傷害研究.....	69
一、傷害協議.....	71
二、應用文明化過程的批判歷史社會學	74
三、國際好公民.....	77
小結.....	80
第五章 結論：Linklater 究竟有無歷史社會學？.....	83
附件.....	88
附件一，Linklater 著作列表.....	88
附件二，相關歷史社會學著作.....	89
附件三，Habermas 針對全球化與歐盟的討論文獻	90
參考資料.....	91
一、中文部分.....	91
二、英文部分.....	93

圖表目次

圖 1 Hobson 定位國際關係理論的架構.....	56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研究動機

選擇 Andrew Linklater 的理論作為研究對象的動機，不僅在於他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界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陣營中，寫作跨度最廣、且最為重要的學者之一；更在於他是一位具備思想深度的國際關係理論家，而這正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相當欠缺的一個部分。

坦白說，今日國際關係依然是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天下。後實證主義自 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興起以來，雖然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對實證主義提出尖銳的質疑，但發展至今仍無法擺脫非主流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 Linklater 的著作等身且在後實證主義的陣營中佔據重要地位，也很難說他對整個國關學界有重大的貢獻或影響，是任何一位國關研究者都不能忽略的人物。然而，這並不代表非主流的研究沒有價值。筆者認為，Linklater 的理論體現了後冷戰時代國關理論、尤其是後實證主義自 1970 年代「國關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¹以來發展的趨勢。比方說，Linklater 的思想深度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前述國關理論研究之缺憾；也或許，Linklater 在科際整合上所下的工夫，也預示著將來國關研究可能的方向。

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作為一個獨立的學門，其理論

¹ 國關學界對於第三次大辯論的內涵，與第三次大辯論是否存在尚有所爭議，然此非本文論述的重點，因此僅提供對此議題的一個簡單整理供參考：莫大華，〈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國際關係的另一次大辯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19 期（2003 年），頁 113-114。

研究與政治學及社會學的淵源頗為深厚，但呈現出來的卻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國際關係和政治學與社會學的淵源深厚這一點並不難理解，顧名思義，國際關係研究的就是「國家之間的關係」。早期現實主義學者研究的都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如 Hans Morgenthau 認為，國際關係是「處於權力之爭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權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則是關於「為權力而鬥爭的國家間關係之學科」。²國際關係的核心即國際政治。因此，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就好比將研究「國內」的政治學方法應用到「國際」；差別在「國家」由「個人」所組成、「國際政治」則由「國家」所組成。這種將「國內」類推到「國際」的分析方式，稱為「國內類比」(domestic analogy)。「國內類比」也發生在社會學的研究上。社會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都有將國際關係視為由「國家」所組成的「社會」，即「國際社會」這樣的論述。進一步來講，諸如「權力」、「結構」、「能動者」等國際學者琅琅上口的名詞，其實也都來自於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可見得國際關係受社會學影響之深。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學學者在界定研究對象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部分學者對此「方法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³傾向抱持批判的態度，這批學者通常被歸為歷史社會學派(historical sociology)。如 Anthony Giddens 即指出，預設民族國家為社會單位的結果，是讓社會學自外於國際關係之分析，從而無法處理超越國家疆界的問題。⁴按照歷史社會學派的看法，欲了解長時期與大規模的社會變遷，研究國際關係與隨之而來的科際整合是不可避免的。

²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A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1978), p.35.

³ 意指側重於國內層次的分析方法，與「方法論的國際主義」(methodological internationalism)相對。可參考 Herminio Martins,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3(2002), pp.217-240.

⁴ Anthony Giddens 著、胡宗澤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新北：左岸文化，2002年)，頁 24-32。

而且，今日的國關研究，和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一樣，多以實證主義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何謂實證主義？本文採用 Mark Neufeld 對實證主義的定義。Neufeld 列舉出實證主義的三個中心教條與其背後的假設：第一，與經驗事實一致者為真，其背後假設為主客體分離，也就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立場；第二，統一的科學方法，其背後假設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第三，科學知識的本質為價值中立，其背後假設為事實與價值分立。⁵而凡是反對前述任一中心教條者，即可稱為後實證主義。對應到國際關係理論中，可稱作後實證主義者，有社會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後結構／後現代主義（post-structuralism/post-modernism）⁶、國際關係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⁷、女性主義國際關係（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IR）、規範理論（normative theory）與歷史社會學等。

既然淵源深厚且皆以實證主義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為什麼筆者要將國際關係同政治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形容為「若即若離」？理由是長久以來，國際關係被視為一門獨立於政治學與社會學之外的學科。換句話說，國際

⁵ Mark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38.

⁶ 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的分野不易釐清，在國關理論界中尤其如此。因此非本文重點，故不擬詳加區分之。可參考：Richard Devetak, “Post-structural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183-184。

⁷ 「批判理論」是一個需要加以釐清的詞彙。葉宗顯為求行文不致混淆，故區分「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ritical IR theory, CIRT）——將廣義的批判理論應用於國關研究，可泛指國關理論的後實證主義、「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將法蘭克福學派應用於國關研究。他的分類雖然清楚正確，其命名卻不具代表性。例如 Richard Wyn Jones 便使用「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一詞，指涉將法蘭克福學派或葛蘭西學派（Gramsci School）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應用於國關研究者，黃旻華更直接以「廣義／狹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區分之，可見「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兩詞之間並無明確差異。故本文將以「批判理論」指涉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皆指涉將法蘭克福學派或葛蘭西學派應用於國關研究者，且不使用任何詞彙指涉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之廣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相關資料請見：葉宗顯，《普遍與殊異：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批判理論的初探與重建》（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4-5；黃旻華，〈評「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0年），頁75；Richard Wyn Jones, “Introduction: Locating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p.5.

關係研究「國際」現象，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國內」現象，「國際」與「國內」現象是截然二分的。這種「國際／國內」、「國際關係／政治學」的二分法，與現實主義在國關學界的發展息息相關。1966年，Martin Wight 發表其著名論文《為什麼沒有國際理論？》（“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指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不同之處，在於國際政治較不易做出進步主義式的詮釋（progressivist interpretation）。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國內政治體系有著重大進展，使得近代國家內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政治理論與法律是「在正常關係及可預測結果之領域內的行為指南或行動規則」，是有關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的理論。然而，國際政治卻是一個事件不斷再現與重複的場域，在該領域中的政治行為大多具有規律的必然性（regulatory necessitous）；甚至諸如革命或內戰等對於國內政治而言屬於極端的事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司空見慣。是故國際理論是有關生存（survival）的理論，且較不能做出進步主義式的詮釋。⁸由此推論，政治理論不適用於國際政治。1979年，結構現實主義者 Kenneth Waltz 進一步指出，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結構大不相同；一為「層級」（hierarchy），另一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兩者適用的規則自然也有所不同。⁹

簡言之，國際關係一方面借用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研究途徑，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彼此的不同之處。兩相作用的結果之下，使得國際關係理論雖然大體上取徑於社會學與政治學，但學科與學科之間有時會存在縫隙，或需要加以澄清、論辯的地方。因此，通過探討像 Linklater 這種學者的研究，可以帶出更多的對話，以補足、釐清國關理論中不足、不明白，甚至是有問題的部份。

⁸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ndrew Linklater,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30-34.

⁹ Kenneth Waltz 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1997年），頁 111-125。

在進一步向下探討前，筆者要先簡單定位 Linklater 本人的研究。一般認為 Linklater 是一位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者，承襲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傳統，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應用 Habermas 的理論和架構來分析國際關係。¹⁰然而，此處有三點需要稍作說明。第一，法蘭克福學派創立於 1923 年，至今已歷經三次重要的思想轉變，著名學者如 Max Horkheimer、Theodor Adorno 與 Habermas，各擁不同的思想內涵；將他們統合於法蘭克福學派之下的，是其共享的理論宗旨——發掘人類解放的障礙並尋求解放的可能性。

二戰爆發以前，Horkheimer 於法蘭克福學派創建之初，便吸納來自各個學科追隨馬克思主義（Marxism）之學者，試圖把 Karl Marx 的理論從過去人爲之僵固藩籬中拯救出來，並完成解放的社會轉化（social transformation）過程。Horkheimer 在其就職演說中以「跨學科的唯物主義」（interdisciplinary materialism）形容這項科際整合的途徑。後來他進一步將理論分成「傳統理論」（traditional theory）與「批判理論」兩種類型，並批判深受實證主義影響的傳統理論，認為其最終將使不公不義的社會秩序得以存續。批判理論則把社會研究作為倫理的一部分，其最終目的為解放被奴役的人。批判理論中另一個由 Horkheimer 確立的重要概念，為「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這是一個區別解放與烏托邦的重要概念，其內涵為探求目前已存於社會卻尚未實現的可能性。二戰後該學派的代表人物 Adorno 與 Horkheimer，對於解放之前景日趨悲觀。他們認為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降昌盛的實證主義，導致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無所不在，最後將創造出充滿宰制與恐怖的社會。隨後，身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的 Habermas，則透過發展溝通行動理論

¹⁰ Linklater 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連結，可見 Richard Wyn Jones, *op. cit.*, pp. 5-10；Richard Devetak, “Critical Theor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60-168。

(communication action theory)，試圖超越過於專注生產關係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者的悲觀與消極態度。¹¹

第二，作為哲學與社會學理論的批判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兩者分屬國內與國際層次。這兩個層次最大的不同，在於國際關係中存在作為政治社群的國家，且為主要的行為者。這個區別讓國內層次的理論無法僅由簡單的延伸、類比或擴大，便可適用於國際層次。因此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不管在發展歷史脈絡、理論所用詞彙與概念上，皆和法蘭克福學派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所以援引法蘭克福學派的國際關係學者，諸如 Linklater、Neufeld、Mark Hoffman、Wyn Jones 與 Ken Booth 等，不僅有其各自的源頭，也分別朝著不同的國關研究領域發展。¹²何況除了法蘭克福學派以外，葛蘭西學派亦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要來源，而且葛蘭西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關聯，不能只用一體兩面簡單概括。¹³這也是為什麼 Wyn Jones 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稱為「集合」(constellation) 的原因。¹⁴

第三，儘管 Linklater 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確實受 Habermas 影響，卻也絕非僅止於此。Kimberly Hutchings 曾如此描述其理論：Linklater 的理論是在不斷同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對話與相互批判下，逐漸發展而成。¹⁵筆者認為 Linklater 之所以實行科際整合與國關理論的綜合，有其歷史脈絡，也就是實踐前述 Horkheimer 的跨學科唯物主義。此外，由於 Habermas 近年來亦投入國際關係規範理論的寫作，且其論述與 Linklater 有一定程度的

¹¹ 關於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起源與流變，可參考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9-90。

¹² 除 Linklater 以外其他學者的簡介，可參考：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 259-301。

¹³ 可參閱：Richard Wyn Jones,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pp.5-6。

¹⁴ *Ibid.*, pp.5-10。

¹⁵ Kimberly Hutch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Rethinking Ethic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71。

差異，故可曰 Linklater 與 Habermas 在國關理論上的差距越來越顯著。

然而，正由於 Linklater 本人的野心極大，試圖透過對話、辯證的方式融合各家思想，反而使其理論博雜不純。此外，儘管理論的最終關懷沒有改變，其關注焦點卻不斷變動。從最初試圖打破「國內／國際」、「國際關係／政治學」二分，建立一調和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簡稱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PT）¹⁶；到後來吸收 Jürgen Habermas 的理論，關注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的擴大與轉型；到目前將心力放在探尋「世界主義式傷害協議」（cosmopolitan harm conventions, CHCs）之發展與潛能。可以看到，最初 Linklater 探討的是政治哲學，而後逐漸將重心轉移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乃至於歷史社會學。總之，他嘗試建立一個跨度極廣且奉人類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為圭臬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具體做法是致力於科際整合與國際關係理論的綜合¹⁷，並提出一個完整的研究架構，包含哲學／規範、社會學以及實踐（praxeological）的面向。

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研究計畫，如果筆者試圖完整回顧 Linklater 的理論，本論文最後將淪為一篇介紹性文字。更何況，近年來已有介紹其研究的中文文獻；雖然為數不多，但也足夠讓吾人扼要掌握其理論的概貌，實在沒有必要過度重複前人已完成的工作。因此筆者決定選擇 Linklater 理論中一個重要且與國際關係相關程度甚高的面向，作為本論文探討的對象；

¹⁶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直譯當為「國際政治理論」，但根據林炫向的見解，「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容易引發一般國際關係研究者之誤解，而認為該詞指涉一般國際關係理論，如 Kenneth Waltz 的名著《國際政治的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為避免上述混淆，林炫向建議改以「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稱之。筆者在此採用該詞，目的也在避免混淆。必須注意的是，「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並非通用詞彙。見林炫向，〈國際關係學與政治理論的重新結合：以羅爾斯的《萬民法》為鑑〉，《全球政治評論》，第 28 期（2009 年），頁 5。

¹⁷ 國際關係理論的綜合與科際整合，並不是兩個完全分離的概念。本文在此區分這兩個概念，只是想藉此表達 Linklater 一方面向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如政治哲學取經，另一方面也與國際關係學科中其他國關理論對話的努力。若純以科際整合或理論綜合一詞概括之，似有偏頗之嫌，因此並用二者以求完整表述。由於詳加分別此二概念將偏離本研究方向，故不擬為之。

此即歷史社會學面向，位於前述 Linklater 的三面向研究架構下的社會學分析，他稱之為「批判歷史社會學」(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其主要內容是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對於人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亦即對普遍和特殊之間關係的看法，找出可作為改變現在世界、超越西發里亞體系之基礎的普遍性道德資源。其目的具有批判性，乃是希望借此指認現存社會秩序中所潛伏之未來改變的契機，以達成人類解放的理想。

與之相對應且具備同等重要性的研究主題是「政治社群」。什麼是「社群」？Linklater 將其理解為「涉及包容 (inclusion) 與排他 (exclusion) 的體系」。¹⁸主權國家不僅是政治社群的一種形式，更是組成當前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政治社群形式。對其他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尤其是現實主義，而言，國家是國際關係中最主要的行為者與最重要的組成單位。許多國際理論都抱持「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 這樣的立場，也有許多國際理論試圖取代此一立場，可謂國際學界長久以來激烈辯論的主題之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那麼 Linklater 又是如何看待國家？前已提及，國家是政治社群的一種形式。他認為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社群，存在一基本的矛盾：一方面，在國家建立 (state-building) 的過程中，國家持續弭平國內各社群間的差異，以賦予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的方式將渠等包容進去；但另一方面，隨著國家疆界的確立，人被劃分為本國人與外國人，從而使人擁有「人」與「公民」的雙重身分。相較於部落之類更原始的社群，國家擁有更大的包容性；但在國際關係的場域中，國家間卻具有排他性。Linklater 因此主張，當代人的歷史任務，在完成政治社群的轉化，以克服這種矛盾。這樣的思考方式乃受 Hegel 之影響，Linklater 相信人類的歷史是朝著包容性與普遍性愈

¹⁸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2.

來愈強的方向邁進。透過對社會制度的考察，他發現一系列愈來愈理性化的社會制度中蘊含著人類自由的發展軌跡；這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從部落社會開始，然後發展出國家，最後甚至達到他所謂的「後西發里亞秩序」(post-Westphalian order)。¹⁹

上述 Linklater 的看法成立嗎？究竟有無疑問？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課題之一。而儘管 Linklater 這些關於政治社群演變與國家建立的論述，位處於其研究架構中的社會學分析，大體屬於歷史社會學之範疇。然而他的歷史社會學與一般的歷史社會學又存在重大差距，因此筆者擬以歷史社會學結合本文論題，探討 Linklater 這種黑格爾式的進化觀點，與其他歷史社會學派之不同，並提出可能的問題。什麼是歷史社會學？簡單來說，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底下的一個次領域，關注宏觀(macro)、大規模的歷史變遷，並試圖提出結構性的因果解釋。²⁰ Theda Skocpol 認為，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共享以下四個特徵：第一，關切具體時空脈絡中的社會結構或過程；第二，強調歷時的過程，在解釋因果時重視時間序列；第三，他們注意有意義的行動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連，以解釋個人生命或社會變遷中的意圖與非意圖後果；第四，強調某種特定社會結構或變遷模式的特殊性與變異性。²¹ 歷史社會學雖然流派眾多，其範圍與定義也有模糊之處，但大體而言，該學派的研究多從「物質」層面出發，探究物質條件改變所帶來的影響。Linklater 的歷史社會學卻是從「理念」的層次出發，探究的是理念改變與演進的歷史。既然 Linklater 以他獨特的方式詮釋歷史社會學，並提出一系列關於人類自由之理念與制度演化的歷史，吾人也能夠從主流的角度檢證其論述。以上即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¹⁹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0), p.135.

²⁰ 詳細內容將於第三章敘述。

²¹ Theda Skocpol,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二、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研究動機，筆者將本文研究目的分為三個部分：

- (一) 第二章以系統性的方式回顧 Linklater 的理論，描繪其經由與各式理論對話而演變的軌跡，並釐清歷史社會學面向在其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
- (二) 第三章闡述歷史社會學之內涵；其為何與國際關係產生對話；多數研究者的取徑為何；及其與 Linklater 之批判歷史社會學的比較，藉此指認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與批判歷史社會學的特殊之處。
- (三) 在第四章中，便以 Linklater 發展出來的三面向研究架構，深入其研究的兩個重要主題：政治社群的轉型與傷害協議。其中，在政治社群的轉型部分牽涉到 Linklater 對全球化的觀點，此可與 Habermas 之於全球化的觀點加以比較，並找出 Linklater 在社會學分析上的可能問題。傷害協議是 Linklater 目前持續進行的研究，晚近他更結合「人類的相互連結性」(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加以分析。透過探討此一議題，當有助於掌握 Linklater 在社會學分析上最新的變化。
- (四) 第五章作結。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中文部分

國內介紹或討論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並不多見，專門討論 Linklater 的文獻更是鳳毛麟角，可見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至今仍處於台灣

國關學界的邊緣。國關教科書如張亞中主編的《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對於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多僅作概略性的介紹，篇幅遠遠不及主流國關理論。²²不過近年來討論 Linklater 的相關文獻，已有逐漸增多之趨勢，唯目前仍無與本文採取相同研究途徑者。

黃旻華的碩士論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可以算是第一份對批判理論的發展脈絡、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與 Linklater 有較為深入探討的文獻，筆者們可藉此對 Linklater 學術生涯早期的研究產生初步的掌握。Linklater 學術生涯早期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社群上，偏向倫理學與社會哲學；黃旻華指出 Linklater 的第一本書：《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人與公民》(*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簡稱 *MC*)、與第二本書《超越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係》(*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簡稱 *BRM*) 構成其在國關理論上的整體架構。在短暫地介紹這兩本書揭示的主要立場後，黃旻華接著整理出 Linklater 與 Habermas 兩人在道德的普遍性、世界主義以及理性主義上的立場之相似處。最後，黃旻華對 Linklater 的理論提出兩點質疑：首先是理論規範的實踐問題，即人類社群 (*community of mankind*) 的理想要如何與當代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相調和。其次，促成這種新政治社群出現的動力來自何處，非僅專注於規範倫理學便可獲得解答，還需經由對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能得之。²³

黃旻華的兩點質疑已在 Linklater 後來的著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應，比如說在他的第三本書《政治社群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簡稱 *TPC*) 裡，

²² 黃競涓，〈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後實證主義學派〉，收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7年)，頁 134-137。

²³ 本段參考：黃旻華，前揭書，頁 273-284、360-362。

便進一步完善原先的理論架構，使其含括哲學／規範、社會學與實踐面向，甚且他近來所關注的議題也已從社群擴展到傷害問題與公民身分等。這些都是黃旻華撰寫其論文當時尚未發生者，自然 4 也無從著墨。

葉宗顯的碩士論文《普遍與殊異：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批判理論的初探與重建》是國內第一篇專門討論 Linklater 的文獻。葉宗顯把研究重點放在 Linklater 批判的國關理論與傳統政治哲學、法蘭克福批判理論之接合處，並以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之爭貫串整個研究。他的研究架構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澄清 Linklater 在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上所持的立場。接著，分別從規範／哲學、社會學與實踐面向切入，探討 Linklater 批判的國關理論中幾個重要的主題，包括：國際關係倫理學中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衝突、如何以辯證的方式整合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找出政治社群轉變的力量、與英國學派對話並加以基進化（radicalize）。最後，討論現代與後現代的爭辯。²⁴

洪鑣德在其《國際關係學說中批判理論》一文，與前述黃旻華討論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架構相似，同樣以法蘭克福學派為出發點，系統性闡述批判理論的發展歷史與內涵；進而延伸至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並給予 Linklater 相當篇幅的介紹。差別之處在於該文於 2010 年刊載，比黃旻華的碩士論文足足晚了 12 年，故對於 Linklater 的介紹完備許多；作為一篇整理性質的文獻，參考價值自然更高。²⁵

其餘相關國內文獻，均以 Linklater 理論中的特定部分作為分析對象。郭懷舜在其碩士論文《「威爾斯學派」之批判安全》中，整理出 Linklater 對政治社群與人類安全之間連結的看法與論述；²⁶林炫向與陳牧民合著的

²⁴ 葉宗顯，前揭書，頁 1-19。

²⁵ 洪鑣德，〈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3 期（2010 年），頁 1-30。

²⁶ 郭懷舜，〈「威爾斯學派」之批判安全研究〉（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66-69。

《國際關係規範理論》一文中，特就 Linklater 用以超越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的二元對立之努力加以分析。他們的結論是 Linklater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家，其所使用的辯證法尚不如 Habermas 來得有說服力。身為哲學家的 Habermas 在社會學與實踐上的分析，反而優於 Linklater。²⁷

大陸學界受其官定意識型態的影響，教科書必有專章介紹以馬克思主義為首之左派國際關係理論。然較受重視的國關理論教科書諸如王逸舟的《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與倪世雄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均無介紹 Linklater。²⁸只有白雲真與李開盛 2009 年出版的《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對於 Linklater 的理論架構做了簡單交代，但所用資料亦僅限於 Linklater 的前三本書。²⁹可見大陸的教科書對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乃至於 Linklater 的介紹，也相當有限。

期刊論文方面，陸昕與白雲真曾於 2008 年發表〈試論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以林克萊特的學術思想為個案研究〉一文，簡介 Linklater 及其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關聯。³⁰閻靜的〈試析林克萊特批判歷史社會學視角中的世界主義傷害協議〉一文專則門介紹傷害問題，³¹不過彼時 Linklater 尚未出版其對傷害問題研究的專書《世界政治中的傷害議題：理論考察》(*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簡稱 TPH)，她的資料來源也因而受限。

Linklater 的研究與理論經由上述文獻以足呈現出全面的初步輪廓，然除閻靜的文章之外，其餘文獻的取徑皆與本研究相異；即便是閻靜的文章，

²⁷ 林炫向、陳牧民，〈國際關係規範理論〉，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 年)，頁 194-196。

²⁸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1999 年)，頁 258-303；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03 年)。

²⁹ 白雲真、李開盛，《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杭州：浙江人民，2009 年)，頁 213-219。

³⁰ 陸昕、白雲真，〈試論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以林克萊特的學術思想為個案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 6 期(2008 年)，頁 88-91。

³¹ 閻靜，〈試析林克萊特批判歷史社會學視角中的世界主義傷害協議〉，《學術論壇》，第 2 期(2009 年)，頁 140-144。

也僅是綱要性介紹 Linklater 的批判歷史社會學之內涵、緣起與傷害協議目前的研究內容而已，而未有進一步分析。

二、英文部分

英語系國際關係學界對於 Linklater 的討論不算少，但全面探討其批判歷史社會學的文獻仍付之闕如。Martin Griffiths 於 1999 年出版的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中，詳盡收錄學界對於 Linklater 早期著作的評論。這些評論多聚焦於後設理論層次，以及國際關係中批判理論和規範理論的發展，非常有參考價值。該書並整理出對 Linklater 兩點質疑：他所提倡的科際整合途徑需要更多論述，以免自己的理論落入批判多於創建之弊；並且，使用 Habermas 作為構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基礎，可能反過來阻礙理論在實踐面向的發展。³²

Linklater 學術生涯最重要的書 *TPC* 頗受學界重視，1999 年 1 月《國際研究回顧》（*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曾以論壇形式專門討論此書。

³³他們的討論重點大都在現代與後現代之爭，以及世界主義本身的概念上。

34

³² Martin Griffi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38-143；另外，把焦點擺在 Habermas 對話倫理與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之連結的文章有：Richard Shapcott, "Cosmopolitan Conversations: Justice Dialogue and the Cosmopolitan Project," *Global Society*, Vol. 16, No. 3 (2002), pp. 221-243；Martin Weber, "Engaging Globaliza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Global Political Change," *Alternatives*, No. 27 (2002), pp. 301-325。

³³ Jean Bethke Elshtain et al., "Forum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1 (1999), pp. 141-175.

³⁴ 相關文獻多如牛毛：Mark Hoffman, *op. cit.*；Chris Brown,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Anti-Foundational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1994), pp. 213-236；Else Kveinen, "Citizenship in a Post-Westphalian Community: Beyond External Exclusion?,"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6, No. 1 (2002), pp. 21-35；R. B. J. Walker, "Hierarchic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1 (1999), pp. 154-156；Raymond Duvall and Latha Varadarajan, "On the Practical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2 (2003), pp. 75-88；James Bohman, "We, Heirs of Enlightenment: Critical Theory, Democracy and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3, No. 3 (2005), pp. 353-377；Deniel Jones, "The Origins of Global City: Ethics and Morality in Contemporary Cosmopolitan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1 (2003), pp. 50-73；Eduard Jordaan, "Cosmopolitanism, Freedom and Indifference: A Levinasian View," *Alternatives*, No. 34 (2009), pp.

少部分學者援引 Linklater 的理論來進行研究。Michael Mason 和 Lorraine Elliott 均以 Linklater 的 CHCs 切入，分別探討世界主義式環境傷害協議的制定過程與內涵。³⁵ Rickard Saull 借用公民身分的概念，以法國大革命作案例研究，探討公民身分與政治社群的轉化。³⁶ Giorgio Shani 則使用對話倫理的概念，探討一個重視普遍性且尊重文化差異的對話社群，要怎麼調和與伊斯蘭教與錫克教之間的關係。³⁷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 文本分析

筆者將蒐集並閱讀 Linklater 的著作，嘗試達成本文的三個研究目的。首先，系統性地理解並分析其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架構，故把 Linklater 的著作汰除重複部分後，整理如附件一。其次，由於歷史社會學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筆者將相關歷史社會學的文獻整理於附件二。由於歷史社會學的文獻相當多，而本論文重點在於國際關係理論與歷史社會學的對話，故會據此取捨之。至於相關 Habermas 對全球化之觀點、對歐洲聯盟發展之觀察與討論文則簡單整理於附件三。

83-106。

³⁵ Michael Mason, "Citizenship Entitlement Beyond Borders? Identifying Mechanisms of Access and Redress for Affected Public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No. 12 (2006), 283-303; Lorraine Elliott,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al Harm Conventions," *Global Society*, Vol. 20, No. 3 (2006), pp. 345-363.

³⁶ Richard Saull, "Transforming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Cas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Global Society*, Vol. 16, No. 3 (2002), pp. 245-275.

³⁷ Giorgio Shani, "Relig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vincializing' Critical Theory: Islam, Sikh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p. 417-433; Giorgio Shani, "Toward a Post-Western IR: The Umma, Khalsa Panth, 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0 (2008), pp. 722-734.

二、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根據研究目的同樣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勾勒出 Linklater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架構，繼而以系統性的方式回顧 Linklater 的理論，描繪其經由與各式理論對話而演變的軌跡，並釐清歷史社會學面向在其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接著分析其批判歷史社會學的特殊之處與可能產生的問題；最後由批判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政治社群的轉型與傷害協議／人的相互連結性等兩個主題。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限制，在於研究科際整合與理論彼此間的對話，所需要探索的領域實在太廣。筆者既不可能閱讀完所有相關理論的作品，並深入彼等背後的脈絡，也不可能在本研究中將其全數交代清楚，因此只好將視角一定程度限縮在歷史社會學面向的分析上。希望透過處理本研究的三個主題，收到可由小見大的效果；從 Linklater 在科際整合與理論對話上的貢獻以及對批判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探討，展望國關理論界的未來發展。

第二章 理論概述—Linklater 的歷史社會學

Andrew Linklater 的理論的一個主要特色，是透過與眾多其他理論學派對話發展而成。本章目的一方面在系統性介紹其理論，另一方面釐清與其他理論學派的關係，嘗試定位他的理論。為求更易於掌握其理論綱要，筆者試著將其學術生涯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致力於建立一個含括規範（normative）、社會學（sociological）與實踐分析的研究架構。其內容以他的前三本著作：《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人與公民》（*MC*）、《超越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係》（*BRM*），與《政治社群的轉型：後西發里亞時代的倫理基礎》（*TPC*）為主，是他的研究成果中最廣為人知與討論的部分。在建立此一研究架構的同時，他也提出「批判歷史社會學」的雛形，並將之置於社會學分析底下。

Linklater 進一步在第二階段集中探討社會學面向，此部份包含他 2000 年以後陸續發表的文章與專著，主要有與 Hidemi Suganami 合著的《英國學派與國際關係：一項當代的重新評價》（*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簡稱 *ESIR*）、《批判理論與世界政治：公民身分、主權與人性》（*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簡稱 *CTWP*）的第二與第三部分，以及最新於 2011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傷害議題：理論考察》。在此階段中，傷害問題（the problem of harm）是其分析重點。

本章並將採取時序式的方式呈現 Linklater 的理論之流變，這麼做的理由可以從 Yan Jing 對 Linklater 所做的一次訪談中窺知。Linklater 在該次訪談中回顧自己從接近三十年前出版 *MC* 到最新發表 *TPH* 的過程。他將之描

述為「視界的逐步擴大」(a progressive widening of horizons)。³⁸所謂「視界的逐步擴大」，指的就是其研究以「人與公民」(men and citizens)為出發點，目的在調和普遍與特殊之對立；而研究重心從公民身分擴展到社群 (community)，再從社群擴展到傷害。公民身分的問題就是前述「人作為公民 (man qua citizen) 所應盡的國家義務，與人作為人 (man qua man) 對世界上其他人所應負的責任，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社群的問題是：「如果有朝一日出現一種打破國家區分國民 (insiders) 與外國人 (outsiders) 的新型政治社群，支撐此種政治形式的倫理原則為何？」最後，對傷害問題的探討，則聚焦於透過訂定全球協定使人免於各種形式之傷害的可能性。

準此，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 Linklater 研究國際關係的起點，亦即包容與排他的規範性議題；第二節描述他轉向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並試圖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的過程；第三節闡述他提出的三面向分析架構；第四節嘗試 Linklater 與歷史社會學的關聯，釐清歷史社會學此一面向在其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

第一節 重建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

雖然 Linklater 強調一個完整的國際關係研究不能缺少規範、社會學與實踐任何一個面向的分析³⁹，但是他本人最初關心的焦點也只有規範性問題而已。從他把規範性問題擺在其研究架構的首要位置，亦可觀察到 Linklater 研究上的最終關懷何在。在第一本著作 *MC* 中，他開宗明義地把

³⁸ Yan Jing, "Interview Questions for Professor Linklate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2/04/15), http://www.aber.ac.uk/en/media/cass_interview_for_professor_linklater.pdf.

³⁹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p.8-10.

「人與公民」此一由當代主權國家體系造成的緊張對立，視為今日人類解放的最主要限制，並謀求解決之道；具體做法是向政治理論取徑，並試圖打破傳統政治理論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隔閡⁴⁰，進而發展出一種調和「現存多樣化且分立的政治社群」與「新發展的關於人性之普遍性的信念」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同時移除對現代國家體系往更自由與普遍的方向發展之阻礙。⁴¹換句話說，是透過「回顧過去的思想家們針對上述『人與公民』、『包容與排他』（inclusion and exclusion）之爭論所做的思考，及其彼此間的對話，並加以批判與辯證」這樣的方式，來一方面為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以下簡稱世界主義）中的倫理普遍性（ethical universality）⁴²辯護，另一方面論證當今由現代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並不完美，仍有進步的空間；最後創造出一種能夠包容差異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以促進人類解放。

既然要創造出一種包容差異的普遍主義、要移除主權國家對人的自由加諸之限制，Linklater 所提出的理論必然包含國際關係的轉型；更具體地說，是要論證當前國際關係存在進步的潛力與動能。此與現實主義者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截然不同，Martin Wight 在 1966 年發表的論文《為什麼沒有國際理論？》便寫得很清楚，筆者在第一章已述及。

既然 Linklater 要做的事情與 Wight 完全相反，是要對歷史發展做出進步主義式的詮釋，他當然首先挑戰 Wight 那「國際理論不存在的斷言」。Linklater 指出 Wight 筆下由國家所組成之國際體系，背後有兩個主要的錯誤假定：第一，人最根本的政治義務與其所處之社會形式彼此相連，人有

⁴⁰ 進一步補充，Linklater 認為人與公民的區別是造成國際關係研究與傳統政治理論學科分野的重要原因。可見得「人與公民的區別必須超越」，以及「傳統政治理論學科分野必須打破」，是互為表裡的兩個論斷。見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

⁴¹ *Ibid.*, pp.18-19.

⁴² 倫理普遍性與倫理特殊性（ethical particularity）相對。Linklater 在 *MC* 中，又將此二者分別對應到「人」與「公民」這兩種人所具備的身分上。

義務保護此政治結構，亦即主權國家可欲且必須保護的；第二，當前主權國家體系造就的秩序是可以接受，並應予維持的。⁴³此二假定雖然是透過對當前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觀察建立而成，卻沒有對社會制度暨其歷史給予合理解釋。更重要的是，人的利益並非內生於個人。按照 Karl Marx 的觀點，人是歷史的產物，且必然受所屬文化影響，其利益與目的皆由所屬社會建構而生。因此，要做出對人的利益之有效假定，必須先確定其所處的社會－政治框架是有效的。換言之，在此過程中考量政治哲學是必要的。⁴⁴Linklater 的意思是，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不能忽略文化所帶來的束縛，同時必須保持信念，相信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能夠為國際政治提供進步主義式的詮釋。

這樣的信心何來？Linklater 認為存在於今日國際體系中不斷增長的經濟與社會互賴，以及其他較過去更為緊密的連結，已為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之發展提供基礎。當國家的邊界逐漸消融，人將不再只是被主權國家隔離開來的公民，而同時作為全人類之一員。⁴⁵所以 Linklater 認為今日有關「政治學／國際關係」的學科分野，不僅沒有必要，更會阻礙其架構理論之發展。因為將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區隔開來者，正是倫理普遍主義（ethical universalism）與倫理特殊主義（ethical particularism）⁴⁶長久以來的緊張對立關係；而 Linklater 本人又確信此一對立關係可以被超越，那麼學科分野對他而言自然是不必要的。這正是他要建立一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之理

⁴³ *Ibid.*, p.4. 其實他還有第三個質疑：合作在國際上僅發生於滿足各國利益之情況下。見 *Ibid.*, p.38.

⁴⁴ *Ibid.*, pp.7-9.

⁴⁵ *Ibid.*, pp.5-6.

⁴⁶ 此二主義之對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應到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之緊張關係。Chris Brown 指出，其為國際關係規範理論的核心問題。見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簡要比較可見白雲真、李開盛，《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杭州：浙江人民，2009年），頁319；David Morrice,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26 (2000), pp.233-251;

由。

進一步而言，Linklater 主張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必須與其他傳統政治和社會理論一樣，能夠體察到「社會和政治思想是人的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的提升，與人有意識地介入社會世界來實現其創建的人類計畫之重要表達」，而且「理論活動必須被放在人之自由的進步此一脈絡係來理解。所謂自由指的是人能夠以理性且有意識地控制其社會關係之程度」。⁴⁷換言之，Linklater 是透過考察人由古至今在社會與政治思想上所體現的進步，來論證人類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轉型之潛能。

接下來，Linklater 便展開對政治思想史鉅細靡遺地考察，指出「人與公民」在國際關係上的衝突關係，係源於西方古文明中潛藏在政治社群裡對於「實證法」和「自然法」的相對思考。⁴⁸而身為政治社群形式之一的現代主權國家，同樣兼具倫理特殊主義與倫理普遍主義這兩種道德觀點，分別可以對應到社會契約與斯多葛—基督（Stoic-Christian）這兩種政治理論。⁴⁹要超越此一二元對立來重建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Linklater 認為 Immanuel Kant 的思想最適合作為出發點。因為

Kant 的計畫是從建立目的（ends）開始：人作為理性生物有能力逃離由自然所宰制的世界，因此有著無條件的責任去促進這件事情發生；而且康德進一步主張，政治世界應該朝「全人類生活在和諧狀態下，且他們的理性都受到絕對命令規範」這樣的方向進行根本轉型。⁵⁰

根據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德理性主義（Kantian rationalism）是一種普遍主義。所謂「全人類生活在和諧狀態下，且他們的理性都受到絕對

⁴⁷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1.

⁴⁸ *Ibid.*, Ch.2.

⁴⁹ *Ibid.*, pp.41-47.

⁵⁰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99.

命令規範」，指的就是「目的王國」(the kingdom of ends)。亦即人皆具有相同且不變的理性能力，只是受到現實的阻礙；透過啓蒙可移除這些阻礙，讓人得以使用其理性能力「逃離由自然所宰制的世界」。

不過對 Linklater 而言，Kant 理性主義並非沒有問題。Kant 理性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絕對主義 (ethical absolutism)，在本體論上採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的立場；認為既然人皆生而具備相同的理性，那麼存在普遍道德也是理所當然的。上述主張受到歷史主義 (historicism)⁵¹ 嚴重挑戰，前述 Marx「人是歷史的產物，且必然受所屬文化影響」的論述，便是歷史主義的觀點。與 Kant 理性主義相對，歷史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相對主義 (ethical relativism)；否定個人主義的立場，主張理性會根據每個人所處的文化情境不同而有所差異，文化彼此之間又存在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然不存在普遍的道德原則。⁵² 根據歷史主義的主張再往下推，可得出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的立場。這意思是說，社群——尤其是國家——最重要的功能，在保存並加強其成員的文化；主權國家體系所體現的，正是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簡言之，歷史主義揭示了普遍主義其實並不普遍。以今日的國關理論為例，任何被宣稱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往往只是西方白種男性的特殊價值觀而已，根本經不起檢視。

所以 Kant 理性主義需要辯護與修正。Linklater 如何辯護？他從三個層面剖析歷史主義的問題：歷史主義本身文化的限制、低估人的能動性以及忽略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首先，他藉由一個例子凸顯出文化多元主義其實蘊含「文化多元必須被尊重，且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可以逾越之」的大前

⁵¹ 根據 Linklater 在 *MC* 的敘述，歷史主義源自歐洲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興起的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傳統。見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7.

⁵² *Ibid.*

提，這個大前提本身就是一種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例子是這樣的：假設世界上存在甲、乙兩個國家。甲國採取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尊重乙國文化。然而乙國的文化卻認為自己優於任何其他文化，甚至與任何乙國以外的國家敵對而企圖征服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甲國沒有道理本著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與乙國交往。⁵³換言之，文化多元主義只有在甲、乙兩國都能夠接受「沒有任何道德原則能超越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方能運作。所以不僅「文化彼此間之間缺乏不可共量性」的論斷不成立，甚至可以發現文化多元主義其實與理性主義一樣，也具有歷史與社會性。既如此，文化多元主義亦非不證自明，同樣需要為自己的理論前提提供更多辯護。其次，歷史主義傾向將文化視為鐵板一塊，好像文化是一種固定的東西，而且身處文化圈內的人們對自身文化之詮釋也通通一樣。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文化是人實踐下的產物，所以儘管人會受到文化影響，但不能否定人也具有超越與改變文化的能動性。最後，歷史主義批判 Kant 理性主義「把人從歷史脈絡中抽離」的同時，也犯下類似錯誤；歷史主義將人從人與自然的互動中抽離，而僅關注文化與歷史的面向。⁵⁴

那麼 Linklater 又是如何修正 Kant 理性主義？Linklater 接受歷史主義「道德是社會性的，並依據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的主張，並提出歷史哲學(philosophical history)來調和前述倫理絕對主義與倫理相對主義的僵局。大略地說，歷史哲學承認歷史主義「理性為社會性」的立場，卻又認為理性不必然因此多元分歧；重點在理性是可以發展與進步的，所以本身也有歷史。從這個觀點出發，倫理絕對主義與倫理相對主義的對立就成了一個假象。⁵⁵

⁵³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1-24.

⁵⁴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32-134.

⁵⁵ *Ibid.*, p.140.

第一位系統性闡述歷史哲學這個概念者，當推 Kant。他在後期的歷史與政治著作中開始注意到，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人的理性亦逐步發展，從而逐漸自原始的自然慾望和情感束縛中脫出。在此過程中，人獲得了能夠選擇自身目的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是自由的基礎，也讓道德成為可能。接著，Kant 又指出自由有高低層次之分，由最低到最高分別為：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前述選擇自身目的之能力；法定自由（civil freedom）——透過立法限制慾望；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人體認到彼此都具有理性能力，因而將彼此當做目的而非手段，是謂目的王國（the kingdom of ends）。Kant 並主張，目的王國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階段。⁵⁶即使 Kant 沒有明說，我們還是可以從這段論述中，看出他對理性發展的進步詮釋。

不過，Kant 並沒有建立一個「關於理性發展的理論與歷史」。這是因為 Kant 仍未採取「理性為社會性」這樣的立場，使得他雖然注意到個人理性的進步，卻忽略了「社會內部或各個社會之間進步的可能性」；而且「由於 Kant 僅將歷史發展的焦點擺在自由個體的活動上，故也無法提出一個有效的關於改變之理論」。⁵⁷於是，Linklater 帶入 Georg Hegel 與 Marx 的學說，來解套該問題。另一方面，其實 Linklater 也是在考察歷史哲學此一概念的發展。一言以蔽之，Hegel 為 Kant 的歷史哲學加入了歷史主義的色彩；接著，Marx 又把歷史哲學建立在「人與自然互動」此一基礎之上。

Marx 將歷史理解為「人掌控自然的力量不斷精進」，因而「不斷建立更為自由的社會組織」，並且「生產系統是根據人對自身潛力開發的程度來加以排序」。⁵⁸具體來說這個排序是什麼樣子？Marx 區分出三個重要階段：個人相互依賴的關係（relations of personal dependence）、個人相互獨立的關係（relations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以及共產社會（communist

⁵⁶ *Ibid.*, pp.141-143.

⁵⁷ *Ibid.*, p.144.

⁵⁸ *Ibid.*, p.151.

society)。⁵⁹人類理性的發展，在每一個階段都比前一個階段來得更高。進入共產社會階段後，人不僅獲得完全的自由與平等，也得到控制社會互動的能力。於是，統合人類的歷史過程也就完成了。⁶⁰

由上述可以得知，歷史哲學家試圖解釋歷史主體的本質與潛能，他們強調人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能動性——也就是人具備「開啓行動之能力」這樣的自由——並試著理解那些使「個人發展出普遍認同」成爲可能的歷史過程。換言之，他們認爲人的理性並非如理性主義者之主張，是彼此相同且永久不變的；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歷史主義者所認爲的那樣絕對多元與分歧。理性是能夠發展的，因此擁有發展的歷史。其前提在於人保有追求自主與自由的能力（*capacity*），起先公民得以運用這樣的能力在各自社群中實現相互平等之自治；隨著歷史演進，人們也會開始利用這樣的能力批判目前的主權國家，在實現人類以理性共同控制其生活的自由之目標上無法更進一步，進而探尋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社群。⁶¹這種規範性結構／政治是群的變遷，便是其實就是追求人類解放的過程。研究者必須做的事，是找出這股變遷的原動力，並指認其目前之發展趨勢，以「清楚、完整地揭示從『自然狀態』到『理想法則普遍適用的狀態』之可能⁶²」。

總結來說，Linklater 在 *MC* 中試圖透過歷史哲學來調和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人與公民，希望創造出一種更具包容與普遍性的規範立場。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出發，國家也不過是人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爲滿足特定需求所創造出來之社群制度，絕非永久不變。而如果要朝人類解放的目標進行改變，人必須不斷反思與批判現存的「不正義排除」（*unjust exclusion*）來加以前進。在此也可以歸納出 Linklater 在本體論上的三個特性：理論所針對

⁵⁹ *Ibid.*, pp.151-154.

⁶⁰ *Ibid.*, p.153.

⁶¹ *Ibid.*, p.139-161.

⁶² *Ibid.*, p.211.

的社會世界是具有歷史性的、人的自主性以及歷史的發展等。⁶³其中，「理性有其發展歷史」此一論述，在日後 Linklater 的批判歷史社會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綜觀 *MC* 這本書，Linklater 當時從事的研究可謂純然「國際關係規範理論」的領域；倫理普遍性與倫理特殊性並存且對立的現象，其實就是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對立。⁶⁴而從字面上來看，Linklater 所欲建立之「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是國際關係與政治理論的結合，或曰交流對話的平台，專門探討國際倫理或道德關係等規範性問題。國際關係規範理論有狹義與廣之別，林炫向與陳牧民借用 Linklater 所提出的國際關係研究架構——一個完整的國際關係研究應該包括規範的、社會學的以及實踐的分析，指出規範理論可同時指涉對國際規範(norm)之「社會學式的」與「規範的」研究。所謂社會學式的研究，即對國際規範的來源、產生過程及作用所做的解釋與說明；規範的研究則是對國際規範做規範性論證，亦即哲學上的「證成」(justification)。據此，他們主張區別廣義與狹義的規範理論；廣義的規範理論包含「社會學式的」與「規範的」研究，狹義的規範理論則單指「規範的」研究。⁶⁵白雲真、李開盛同樣區分出廣義／狹義規範理論。他們以廣義的規範理論指涉「一切含有價值事實或應然性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觀點的理論或研究。」並引述 Molly Cochran 的斷言，宣稱在這層意義上，所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都是規範理論。至於狹義的規範理論，則指「以價值事實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價值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旨在探尋國際倫理或道德關係的理論。⁶⁶」筆者認為兩派對廣／狹規範理論界定上的不同，僅存在於字面上，而無本質上的不同。Cochran

⁶³ 葉宗顯，《普遍與殊異：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批判理論的初探與重建》，頁 31。

⁶⁴ 林炫向、陳牧民，〈國際關係規範理論〉，頁 194。

⁶⁵ 同上註，頁 175。

⁶⁶ 白雲真、李開盛，《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杭州：浙江人民，2009 年），頁 311-312。

將狹義規範理論定義為「探究世界政治中倫理判斷標準的理論，渠等並尋求那些可以擴展道德包容（moral inclusion）與在國際實踐中重建社會的共享原則。」此與前述兩派之界定亦無本質上之不同。⁶⁷

林炫向與陳牧民並將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研究歸納為三個層次：第一，政治哲學層次；第二，理論層次（包括研究途徑）；第三，實質議題（例如正義戰爭、人道干預、分配正義、民族自決等）。第一個層次幾乎是政治理論家的研究領域，但是國關學者可由此汲取政治理論家的思考與創見，然後應用到第二個層次。在第二個層次上，國關學者可借用各式各樣的政治理論來思考國際關係中的規範問題，甚至促進第一、第二層次彼此的交流對話。而第三個層次為國關學界所固有，但被認為是「研究」而非「理論」。研究者可將此一層次的實質議題拿來檢驗第一、第二層次的理論或途徑，是否有助於解決實際問題，並作為評價它們成功與否的判準。⁶⁸透過區分這三個層次並釐清彼此關係，吾人得窺政治理論與國際關係學界交流對話的實際樣貌，以及國關學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⁶⁹

由上述廣義／狹義的規範理論與三個研究層次回過來檢視 *MC* 的內容，可發現 Linklater 進行的是狹義的規範理論研究，而且屬於第二個研究層次。值得注意的是，林炫向與陳牧民強調國關學者在國際關係與政治理論兩大學科彼此交流的過程裡，可以扮演更吃重的角色，而非僅單方面從政治理論中尋求解答。國關學者亦可從自身傳統中擷取資源進行規範論述，進行雙向的交流。⁶⁹

⁶⁷ Molly Cochran, *Normativ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ragmatic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

⁶⁸ 林炫向、陳牧民，前引文，頁 178-179。

⁶⁹ 同上註，頁 179。

第二節 擁抱國際關係批判論

雖然 Linklater 在 *MC* 中聚焦於規範性議題，但他很清楚既然理性有其發展歷史，規範性議題就不可能抽離時空背景單獨解讀。同樣地，理論也無法脫離當下的時空環境，因為「理論本身便包含歷史」。⁷⁰是故理論建構必須奠基於對現實的分析。此外，既然他想要打破國際／國內學科分工之疆界，那麼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將是無可避免的。

因此在第二本著作 *BRM* 中的一開始，Linklater 便以現實主義、理性主義與革命主義等三個國際關係理論的傳統，來對應國際關係中的三個核心概念：權力、秩序與解放。這三個國際關係傳統的分野係來自於 Martin Wight。⁷¹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都質疑革命主義達成普世和諧的嘗試能否成功。在此，Linklater 嘗試將法蘭克福學派應用於國際關係分析，以塑造國際關係批判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簡稱 CIRT）。他指出，批判理論的優點在於不以不變、普遍的道德原則作為辯護革命主義的出發點，因此在方法論上避開了其他可能的認識論與本體論上之限制。⁷²其方法是辯證的，是透過三大國際關係傳統的彼此辯證，來找出超越當前不斷重複與再現的國際局勢，並實踐更高程度的人類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理論途徑。⁷³這項觀點可謂 *MC* 中「歷史哲學」概念更進一步的發展。

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其理論觀點被認為是批判的社會學。由是觀之，Linklater 的分析從規範層次轉入社會學層次乃不爭之事實。根據葉宗顯的看法，Linklater 之所以取徑於法蘭克福學派，乃是因為兩者在

⁷⁰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2-183.

⁷¹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Holmes & Meier, 1992), ch.1.

⁷²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0), p.8.

⁷³ *Ibid.*, p.10.

理論的後設立場上相近。⁷⁴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透過讓三大國際關係傳統彼此辯證的方式，克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缺陷，並結合現實主義的優點，發展出一種超越兩者的「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 社會學，亦即後馬克思主義式的批判理論。此概念脫胎自 Anthony Giddens。Giddens 主張現代的批判理論必須是後馬克思主義式的，理由是在現代社會中，不同的政治領域將產生不同的改革運動：資本主義持續造成階級衝突；工業化激發生態保護運動；國家監控之增長則是人民起而要求維護一己之公民權的理由；核子武器之威脅則引領和平運動的再興。然而馬克思主義卻僅預設解放政治將來自於資本主義必然朝向社會主義改變。這很明顯是不夠的，因此需擷取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長處來解決前述問題。⁷⁵

此前在規範層次的論證中，Linklater 最後歸結到 Kant 與 Marx，而兩人的歷史社會學同樣具有批判性，以全人類的解放為依歸。只不過 Linklater 認為他們兩人的分析或多或少都落入某種「經濟化約」之觀點，因此存在重大瑕疵。對 Kant 而言，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來自於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自由貿易。對 Marx 來說，生產模式的進步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將引導人邁向共同控制生產工具及其生活的共產世界。Linklater 根據世界歷史後來的走向，指出儘管人類經濟與社會的整合確實是十九世紀的一項重要發展趨勢，但國際衝突也隨之增加，並未如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期，帶來永久和平或共產生活。相反地，國際衝突增加反而促成國家力量在國際與國內場域同時上升。可以這麼說，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把工業化的力量想簡單了，其遠比他們所設想的還要複雜且充滿矛盾。⁷⁶

Linklater 在此看到高舉國家中心主義 (state-centrism) 的現實主義之優點。現實主義挑戰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能夠轉型」的觀點，並從地緣

⁷⁴ 葉宗顯，前揭書，頁 23。

⁷⁵ *Ibid.*, pp.30-31.

⁷⁶ *Ibid.*, p.55.

政治與國際結構的角度，對當前不斷再造（reproduction）的國家體系，以及國家自外交政策上展現出來的技術理性（technically-rational）取向提出解釋。於規範層次上，現實主義更認定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由國家操作與掌控政治是合理的。⁷⁷現實主義的說法凸顯出馬克思主義化約觀點的缺陷，包括忽略國家與認同的持續性，以及更為重要的——各國出於國家構建之需求與戰略競爭之壓力，無不積極尋求提升自己的力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工業化所帶來之人類整合的趨力。即便現實主義有上述洞見，Linklater 仍從批判理論的立場出發，認為現實主義者在本體論上錯誤地假定人生來是不自由的。實際上，現實主義所提供的僅是特定歷史情境下之解釋，在此一情境下，人「尚未」實現共同控制生活的潛能。因此，現實主義理論缺乏對「人可以透過何種政治干預模式來控制自己的國際歷史」的解釋。⁷⁸此外，尤其是新現實主義，其發展到後來也陷入結構化約的另一個死胡同。

從另一方面來講，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 在其理論中並未完全避談或忽視民族主義之興起，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及兩人特別重視經濟因素，使誤認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性終將勝過民族和國家所抱持之特殊性。

Linklater 於是指出，原先 Marx 的部份觀點雖將經濟因素視為歷史演進之主要（primary）因素，國家的存在與競爭則是次要（secondary）因素，可能阻礙歷史進程。可是此主要因素與次要因素的關係，在後來馬克思傳統發展之過程中，卻被扭曲成基礎（basic）現象與衍生（derivative）現象的關係，民族認同與國家等因素在此扭曲的關係架構下，因而不具有獨立的影響力，最終讓馬克思主義走上經濟化約之路；認為生產力改變最終將導致國家與文化認同的瓦解，引導世界邁向共產社會。⁷⁹此一觀點在二

⁷⁷ *Ibid.*, p.32, 166.

⁷⁸ *Ibid.*, p.14.

⁷⁹ *Ibid.*, p.52-53

十世紀初期開始受到現實主義挑戰。

不過，馬克思主義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意識到上述現實主義點出的困境，也且提出許多方法試圖將民族主義與國際競爭等因素整合進原有理論架構。Linklater 想要釐清這些方法究竟有無效果，於是在 *BRM* 一書中，他再次展開漫長的理論歷史考察。這次的考察對象是馬克思主義的眾多後繼者，包含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帝國主義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s）。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承認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並嘗試從經濟角度來說明民族主義，主張由於世界經濟不平等發展，因而導致民族主義的興起。換言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仍視經濟因素為基礎因素，民族與文化則為衍生因素。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更希望民族主義可以作為實現人類自由和平等的墊腳石，亦即將民族主義原本強調特殊性的力量轉化成有助於實現人類普遍平等和共同生活的動力。

可是 Linklater 指出，這種從不平等經濟發展出發的論述無法有效說明民族權利（national rights）的鬥爭，因其不僅低估民族權利的鬥爭即便在消除世界經濟發展不平等仍持續存在的可能性，同時也無法解釋各民族彼此間肇因於非經濟因素的衝突與對抗⁸⁰；其更低估國家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控制民族情緒，以支持其從事地緣政治競爭。⁸¹換句話說，Linklater 認為民族主義不應作為衍生因素，而應該是獨立於經濟因素之外的另一個基礎因素。因此儘管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

帝國主義理論則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帝國主義理論者對於傳統馬克思理論對於由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簡單過程並不贊同。他們提出兩點修正：首先，國家力量和威望在維持資本主義社會存續過程中所發揮之影響

⁸⁰ *Ibid.*, p.72.

⁸¹ *Ibid.*, p.75.

力，必須給予更多重視；其次，早期對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分析與觀點，對於戰爭的影響不是忽視便是嚴重低估。⁸²由此面向觀之，帝國主義理論算是提供了一種對於工業化和國家競爭之間互動關係的說明。

Vladimir Lenin 與 Nikolai Bukharin 這兩位帝國主義理論家，利用並且修正馬克思理論中有關資本主義的壟斷化（monopolization，或譯為「獨占化」）概念來說明國家掌控社會的力量成長，以及國際間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貿易秩序逐漸走上戰爭的原因。Lenin 主張壟斷並不會導致如 Marx 所預期的商品生產過剩，真正的困境反而是多餘資本無處使用。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尋求海外市場消化過剩資本以及殖民。正因為這樣的需求，國家逐漸涉入經濟過程。而國家相繼為其國內過剩資本尋找海外市場之行爲，一方面除顯示帝國主義理論認為在壟斷邏輯下並不存在國內／國際政治的二元區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原先發生在國內的階級鬥爭，轉化為日益激烈的國家間競爭。

不過 Lenin 與 Bukharin 仍試圖證明國家間鬥爭的情勢不會永遠持續，理由是現代戰爭的殘酷將使得勞工階級體認到，採取帝國主義政策所能得到的利益與損失完全不能相比。於是，一種新的革命條件將因此產生。⁸³勞工階級終究會跨越國家、民族和文化界線，而聯合起來創立一世界性的共產主義。此顯示出儘管在帝國主義理論中，民族主義與國家競爭占據重要位置；但終究希望將這樣的趨勢轉化為人類平等和自由的基石，而非僅是一直停留在國家間鬥爭。

帝國主義理論上述關於國家間之所以發生競爭，乃至於戰爭的觀點，受到現實主義強烈質疑。新現實主義者 Kenneth Waltz 特別從兩角度來說明

⁸² *Ibid.*, p.76.

⁸³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77-81.

其弱點：第一，以國內經濟需求作為出發點解釋戰爭的緣起，實際上仍未能脫離經濟化約論的老毛病。他主張此一解釋等同於弱化戰略競爭導致戰爭的重要性。對強調結構對行為者之制約能力的 Waltz 來說，國家間力量不平均分配，便容易導致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出現，而與國內經濟需求較無關連。第二，Waltz 指出既然殖民主義一直存在，而非特定時期內之現象，那麼 Lenin 和 Bukharin 所發展的帝國主義理論，對殖民主義的解釋與分析顯然有時代的特殊侷限。⁸⁴因為他們無法解釋殖民主義一直存在的理由，及其必然性基礎何在。

針對上述觀點，Linklater 認為儘管 Waltz 正確批判帝國主義理論，乃至許多馬克思理論一元解釋觀點的不足，但 Waltz 對於國際競爭和軍國主義（militarism）的說明方式卻提供了另一種一元的解釋觀點，等於是重蹈覆轍。所以 Linklater 試圖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其他更平衡的觀點。

前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雖然認識到資本主義發展將壓榨邊陲地區並造成破壞，但渠等仍堅信資本主義擴張最後會為整個世界帶來好處。因為物極必反，當剝削來到臨界點，便會引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從而使全人類重新結合為一體並享有平等地位；藉由此過程，原本工業落後之區域也能享受到社會和物質的進步。

可是在二戰結束，殖民地相繼獨立以後，世界局勢的發展並不如帝國主義者預期，不僅邊陲對核心的反撲沒有發生，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也難逃成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繼續向下沈淪之命運。帝國主義理論因此受到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的挑戰。新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核心和邊陲的差距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中，不但將持續下去而不會產生革命，甚至這樣的差距還會不斷擴大。Linklater 因此結論：新馬克思主義對舊馬克

⁸⁴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87-90.

思主義的批判意味著傳統的分析標的，也就是生產模式、財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等，需由心的概念架構取代。而在此之中，世界經濟被視為一不平等交換關係的系統。⁸⁵新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得出與舊馬克思主義全然不同的結論，認為邊陲地區要取得自主發展，便需脫離資本主義的全球交換關係系統。

眾所皆知，新馬克思主義主要的兩個分支為依賴理論，與 Immanuel Wallerstein 架構的世界體系理論。相較於以往的社會理論，雖然世界體系理論原本是要嘗試呈現出國家、國際關係和戰爭，在西方的經濟成就以及國際間不平等關係發展中的重要性，但實際上 Wallerstein 僅將國家結構暨其對外關係視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政治組織而已。由此面向觀之，世界體系理論依然陷入某種化約論式的觀點。⁸⁶

根據上述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探討，可發現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雖然都發展出較為重視國家或民族的相對自主性，以及和生產模式之間的關係，但然無法精確掌握國家和國家間的互動與戰略競爭。同樣地，新馬克思主義也未能提出令人信服之觀點。

在探討完馬克思主義國關議論內部的流轉後，可發現儘管無數後進學者嘗試提出更完整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明或回應現實主義的批判，但大體上仍無法脫離經濟化約論之泥淖。不過，馬克思主義可以在兩方面修正現實主義：首先，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能夠發展出解釋階級與國家間，乃至於國家間體系（states-system）與世界經濟間的連結之分析架構。這是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家所忽略的。其次，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與本質之爭論，馬克思主義也有值得注意之處，特別是點

⁸⁵ *Ibid.*, pp.97-98.

⁸⁶ *Ibid.*, pp.119-120.

出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在規範層次上定位極為狹窄與保守的依賴理論。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在依賴理論面前，顯得過於偏好維持國家安全與國際秩序，而忽視世界經濟、政治結構，以及國際權力與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等其他重大議題。⁸⁷

另一方面，(新)現實主義則陷入結構化約論之泥淖。於是 Linklater 提出要創建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如前所述，此概念源自 Giddens。

Linklater 更將目光放向 Jürgen Habermas 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

Habermas，對於馬克思主義生產典範有三項批評：第一，對於從資產階級剝削中解放，馬克思主義者已有探討，但對於國家、家父長、民族或種族等關係中解放，其意味著什麼卻未著墨；第二，缺少歷史社會學，過於強調生產，對於國家建造、戰爭、道德與文化則關注較少；第三，雖然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關於廢除階級關係、私有財產和商品製造之清楚但有限的政治願景，但對於確保生產範圍以外的自由社會秩序，則沒有明確之願景。近來批判理論解決上述問題之方法，為發展不受扭曲之溝通，並創造一個更複雜的歷史社會學；其以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 概念作為基礎，並展望政治民主化。⁸⁸

從社會學習進一步延伸，Habermas 批判 Marx 關於「當人在學習主宰自然的過程中進步時，會創造使自由實現的條件」之假設。Habermas 指出該假設忽略在技術控制的擴張中，隱含新形式宰制得以發展的危險。其解決之道，是區分出各種不同的社會學習過程；這些學習過程對應人多樣化的能力，在普遍主義的基礎上調和此等多樣化的能力，即為對話倫理 (discursive ethics)。對話倫理試圖克服文化本位主義，尤其是歐洲中心主義。在對話的過程當中，任何人和任何道德立場皆不能被事先排除在外，

⁸⁷ *Ibid.*, p.166.

⁸⁸ Andrew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in Steve Smith et al.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1996), p.284.

此即程序的普遍主義。對話使人理解到一己／文化的偏差與狹隘之處，進而找出更好的規範論述。一項規範要取得效力，則需要所有人的同意。依此所有人同意的原則，我們也可以用對話倫理，檢視現存區分內部者與外部者的疆界其正當性是否足夠；甚至用以探索新形式政治社群出現的可能性暨其樣貌故可以說，對話倫理是人類道德發展的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

89

於是我們可以將後馬克思社會學的工作內容摘要如下：第一，正視國家和國際戰略互動的影響力，並將戰爭、文化等其他面向納入，建立一種能夠描述、解釋多重力量相互影響包容與排除的複雜分析架構。換言之，就是賦予國家更重要的地位，以及更精密的分析。第二，要保存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避免落入現實主義窠臼；亦即保存追尋改變現行政治世界之方法或轉變契機的動機，並擴大既有政治社群的疆界、實現普遍主義的構想。

Linklater 嘗試將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 Habermas 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與對話倫理，整合進國際關係分析之努力，使他成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中一支旗幟鮮明的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社會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所欲探究者，為規範性結構與政治社群的變遷。Linklater 呼籲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探究國際關係時，應聚焦於四種社會學習的形式；按照 Habermas 的語彙，則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理性化的過程」。此四種形式分別為：人如何宰制自然、人如何透過衝突來控制他人、國家間／文明間的秩序如何建構，以及如何理性化倫理領域。⁹⁰

在 *BRM* 中，他透過國際關係理論彼此辯證、對話來加以實踐。卻仍留下許多需要進一步釐清與受質疑的地方。首先，既然 Linklater 意圖超越

⁸⁹ *Ibid.*, pp.285-286.

⁹⁰ Jürgen Haacke, "Theory and Prax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bermas, Self-Reflection, Rational Argument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2 (1996), p.276.

當代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並具體實踐世界公民之概念於其中，以達成人類社群之理想，光是規範層次的論述是不足夠的。相反地，更應提示，甚至實踐那些可以轉化當前由主權國家所主導之國際體系的「策略性行爲」。⁹¹其次，如果真如 Linklater 所主張，新形式政治社群出現的可能性是內生於既存社會關係之內，那麼批判理論當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從解開「規範的社會化之歷史」與「排他的實踐」著手，進行批判性反思。⁹²這也正是 Linklater 後來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研究架構的提出

Linklater 在 *BRM* 的最後，已提出其著名的分析架構之雛形。⁹³隨後，他在 1992 年發表的〈關於國際關係理論下一個階段的問題：一個批判理論的觀點〉(“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一文中，完整呈現其觀點。這篇文章不僅總結他當時的研究成果，也為自己規劃出未來的研究方向，可說是一篇承上啓下的指標性文章。

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的下一個階段，指的是國關學界自 70 年代以來傳統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大幅偏向實證主義的趨勢，逐漸受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的挑戰；這些向國關理論正統提出挑戰的流派更進而主張重建 (restructuring) 國際關係理論，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來到轉捩點。⁹⁴而 Linklater 撰寫該文的目的，便是針對國際關

⁹¹ 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282。

⁹² Jürgen Haacke, *op. cit.*, p.278.

⁹³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71.

⁹⁴ Andrew Linklater,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n Steven C. Roach ed.,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42-243.

係理論的下一階段發展發表議論。在這篇文章中，他彙整自己此前的研究成果，並完整地陳述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重心應為何、以法蘭克福學派為淵源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對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可能的貢獻，最後提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具體的研究途徑。換句話說，他是先界定研究國際關係的目標，然後提示可行的理論資源，最後架構出具體的研究途徑。

由前兩段的敘述可知，對於 Linklater 而言，國際關係研究的目標是什麼？是人類解放。人類解放是什麼？Linklater 認為是讓人類獲得自由，亦即「自決和有能力採取（想要做的）行動」。⁹⁵所以要完成人類解放就是要擴大人類自決的能力；具體來說應該怎麼做？唯有透過不斷地批判反思種種加諸於人的限制，方能朝人類解放的目標前進；那麼何者構成對現今人類解放最主要的限制？Linklater 的答案是主權國家，以及目前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⁹⁶主權國家作為當今人類政治社群最主要的形式，是近代西發里亞模式（Westphalia model）影響下的產物。主權國家在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決定了彼此的疆界，使得人同時具有「人」與「公民」的雙重身分。個人作為國家內部的公民必須對國家盡責任，同時個人作為人類整體之一份子，也基於共享的人性對他人負有義務，兩者間無可避免有所衝突。因為主權國家將轄下的公民「包容」進去，並且「排除」其他同為人但非公民者；國家可以為了本國公民的安全與利益，損害他國的安全與利益，遂行種種不平等與宰制，其中最極端的形式便是發動戰爭。有鑑於此，Linklater 認為在當代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下，包容與排除構成了國際關係的核心問題。⁹⁷研究者當考察政治群形成與變遷的過程，並分析

⁹⁵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35.

⁹⁶ Linklater 將主權國家的存在視為「問題」，並將追求主權國家的轉型置於其研究的中心，可見他認為主權國家是對人類解放的最大限制。見：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p.1.

⁹⁷ Andrew Linklater,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p.244.

前述種種不平等與宰制的由來；另一方面，則思考重新建構政治社群以促進人類解放的各種可能形式暨其可能性。其最終理想，是創造一人類社群，在此社群下生活的全人類形同世界公民。

目標界定以後，Linklater 建議下一個階段的國際關係理論應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為宗，發展成國際關係批判理論。該理論可以解決國際關係理論目前所遭遇的僵局，也就是各理論流派間缺乏對話的問題。何以如此？這邊必須稍微岔開來，先談論 Linklater 對國際關係作為一個學科的看法。Linklater 認為，國際關係的中心議題是前述的包容與排他。這是因為國家間體系本身都是包容與排他的體系。而包容與排除此一議題，又存在規範的、社會學的以及實踐的等三個面向，⁹⁸因此對 Linklater 而言，一個完整的國際關係研究必須包含對此三面向的分析。規範的分析目的在回答：作為道德與政治社群的國家，其包容公民並排除非公民的根本原因何在？社會學的分析內容為：當代國家體系中的主流包容與排他之原則，是否正在改變？最後，實踐的分析則關注：各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應遵循習慣上對人與公民的區分（如不干涉內政），還是應該朝更高層次的世界大同主義發展（如人道干涉）？這三面向的分析，正是 Linklater 心目中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研究途徑。

Linklater 指出，絕大多數國際關係的研究途徑都會碰觸到上述三種分析的其中一種、甚至更多；也正是對包容與排除此一議題的關注，成就了國際關係作為一個獨立於政治學與社會學之外的學門。但是，由於各個研究途徑之間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本質」、「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應為何」等議題，擁有截然不同的觀念並缺乏共識，使得國際關係研究陷入瓶頸。所以 Linklater 想做且正在做的事情，便是建立起一個能夠提供各研究途徑對話

⁹⁸ Andrew Linklater,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p.244.

與辯證的框架／平台，亦即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為源頭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從而引領國際關係理論超越「典範間的辯論」(inter-paradigm debate)⁹⁹，邁向理論間彼此整合的康莊大道。

簡單說，國際關係批判理論要挑戰的是「國家作為政治與道德社群，其區隔內部者與外部者的正當性基礎」，並探討創造普遍的道德與政治社群之可能性。Linklater 試圖整合出一個能夠給予國家能動性更精密分析的批判理論，包含對國家構建、地緣政治與戰爭、國家之間的戰略互動、文化與生產關係等要素的分析。¹⁰⁰這其實就是 *BRM* 中所謂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

Linklater 隨後於 1998 年出版 *TPC*，嘗試用上述架構探討政治社群的轉型。儘管在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下，武力與宰制是國際關係的常態，Linklater 藉由點出今日世界政治的合作空間，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社群與公民身分概念正在興起，來主張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將不再是過去的重製；而有可能完成「三重轉型」——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前提下，追求更高的道德與經濟平等，朝向後西發里亞秩序邁進。¹⁰¹不過，Linklater 認為上述架構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因為儘管 Habermas 跳脫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僅注重工具理性的缺陷，進而點出社會互動中的道德—實踐面向，但其分析仍未給予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足夠關注。¹⁰²因此如果要有效地將歷史唯物主義重建之洞見加入國際關係理論當中，便需兼顧不同社會之間的互動所帶來的影響。這正是 Linklater 嘗試通過 Benjamin Nelson 對世界上文明與文明之間相互交往的研究，來補充 Habermas 論述之原因。

⁹⁹ *Ibid.*, p.250.

¹⁰⁰ *Ibid.*, pp.194-95.

¹⁰¹ "Forum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38 (1999), p.139.

¹⁰²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111.

不同於 Max Weber 將世界各個文明視為獨立運作之個體，Nelson 所欲探尋的是各文明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是如何影響文明自身的演變。此處所謂的演變，並不單指涉科學和技術的進步，還涉及道德層面之變化，尤其是各文明如何接受普遍性的共同規範。Nelson 首先指出在這個世界上，完全封閉的文明極端稀少，幾乎可謂不存在；而絕大多數文化或多或少都受到其他文化影響，所以文化邊界是可被滲透且多孔的（porous）。這也意味著個別文化的特性是無法被抽離出文化互動的框架而加以單獨理解的。¹⁰³於是 Nelson 以此為基，嘗試理解不同文明間各自具有什麼樣的道德和文化資源來推動本身參與對話，以發展更為寬廣的普遍性。¹⁰⁴Nelson 的社會學研究對於國際關係而言，是有助於思考三種不同類型的國際關係。首先是原本自我中心色彩的文明如西方、中國和伊斯蘭等，其彼此之間的互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類平等和互惠概念的影響；其次是國家、帝國或文明的統治階級，如何同化或隔離其境內不同的文化；最後，在不同國際系統中，國家彼此之間的互動所採取之排外和包容的態樣為何。¹⁰⁵

Habermas 與 Nelson 的理論開啓了思考溝通和對話的空間，Linklater 繼而轉向結合 Mann 對於帝國和國際社會的分析。在此處 Linklater 試圖透過 Mann 提出之多種形塑道德和政治社群疆界力量的研究，來探索對話而非武力的可能性是否逐漸擴大，或至少現代國際社會中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潛能。在 Mann 的歷史研究中，由於擴張和統治的需要，帝國會產生一種內在意識型態（immanent ideologies）和超越意識型態（transcendent ideologies）的緊張關係。前者是為整合不同文明的統治階級而倡導，後者則是平民為反抗權力不對稱而訴諸的普遍與平等的社會秩序理想。由於在龐大帝國的統治與發展下，大範圍人類共同相處之可能性的基礎已經被創

¹⁰³ *Ibid.*, p.126.

¹⁰⁴ *Ibid.*, p.129.

¹⁰⁵ *Ibid.*, p.132.

造出來；因此上述兩種意識型態的對抗一旦形成以後，將成為推進社會改變的關鍵力量。¹⁰⁶

在帝國內所發生的變化，同樣也產生在帝國瓦解以後諸國並立所構成的國際社會中。普遍道德的影響體現在各國除自己內部的義務外，尚需回應其他兩種更為廣大社群的道德訴求；亦即由多個國家所組成之國際社會，與由所有人組成之人類社群。¹⁰⁷雖然在不同時代中，同一國際社會內部的國家對此的回應與作為都不盡相同，但重要的是 Linklater 認為現代的國會確實有別於過去其他的國際社會。理由在民主文化已根植於現代國際社會中，而且前並無特別立即的危險能威脅現有國際社會之存在。他因此堅信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上，實踐所有人在國際上平等對話和相互同意之理想是可能的。¹⁰⁸



透過前三節完整且扼要地回顧 Linklater 的理論、流變暨其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之過程。如果以 Wight 的三個國際關係傳統檢視 Linklater 的立場，可以說 Linklater 的出發點一直是革命主義傳統，而在不斷與其他兩個傳統辯證的過程中修正。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國際關係的政治理論或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對話，我們都能清楚發現歷史社會學面向在其中的重要性，Linklater 可謂從頭到尾都堅守著歷史研究之必要性。透過國際關係與歷史社會學的科際整合，可將國際關係研究者從現在主義(presentism)中解放，轉而關注長期的歷史變遷；另一方面，也可拓展社會學研究的視野，因為

¹⁰⁶ *Ibid.*, p.136.

¹⁰⁷ *Ibid.*, p.137.

¹⁰⁸ *Ibid.*, p.141.

多數社會學研究者僅專注在短期的研究。¹⁰⁹而需要如此做的理由，在於除非我們把現代世界置於世界範圍的歷史背景下來理解，否則我們將始終難以理解其獨特性。根據 Marx 的想法，歷史社會研究的中心目標乃「從整體面理解人類社會全球化的長期趨勢」。¹¹⁰而要進行這樣的研究，科際整合無法避免。

在 Linklater 三層次的研究架構下，批判歷史社會學座落於社會學層次之分析；並且根據上述三節，我們可以整理出其批判歷史社會學之目的，在指認現存社會秩序中所潛伏之未來改變的契機，因此是具有批判性的。具體方式乃藉由比較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對於人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亦即普遍和特殊之間關係的看法，並找出可作為改變現在世界之基礎的道德資源。

更重要的是，Linklater 認為其批判歷史社會學不同於其他歷史社會學流派之處，在於對理念領域（ideational sphere）的重視，尤其是道德與文化的變遷。¹¹¹他進一步點出，被歸類為英國學派的 Hedley Bull，在區分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s）與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ies）時，表示國際體系乃由地緣政治競爭與時常爆發的戰爭所構成，國際社會則由共同價值與利益，以及制度所構成。換言之，制度與理念的長期變遷本應作為歷史社會學研究之一部分，卻為目前多數歷史社會學流派所忽略。¹¹²這是歷史社會學在科際整合之過程中所產生的特質，其分析目標與方法都是多元的。在分析目標上，部分研究聚焦於現代社會的興起，也有研究者進行不同年代下國際體系的比較研究，更有研究者關注影響人類整體的長期趨勢。但他們共同的關注，是人類社會在複雜的全球結構下整合的長期過

¹⁰⁹ Andrew Linklater,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36.

¹¹⁰ *Ibid.*, p.137.

¹¹¹ *Ibid.*, p.147.

¹¹² *Ibid.*

程。¹¹³

在方法論上，有些研究給予權力、生產關係或理念力量更重要的位置，另有些研究則把道德與文化的發展程度置於其研究核心，更有部分研究試圖把所層次整合進一個單一的解釋架構。

在 Linklater 所欲承襲的 Kant 和 Marx 思想中的社會學面向，也具有同樣特質。在此二位思想家的觀點中，「社會學分析具有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道德瑕疵能被消除之可能性，這是藉由將社會中擴大人類平等相互對待範圍的現存潛能給釋放出來」。¹¹⁴我們也可以觀察到，Linklater 在發展批判歷史社會學此一研究途徑的過程中，同樣是以不同理論與思想間彼此對話辯證的方式為之，包括前述 Kant 與 Marx、Wight、Giddens、Habermas、Nelson 等人在內。



本章以三節的篇幅呈現 Linklater 理論之流變，凸顯其最初與最終的關懷、與各式各樣理論對話辯證的過程，並闡述其三層次的研究架構。第四節便以前三節為基礎，討論其理論與歷史社會學的關聯，及其批判歷史社會學之重要主張。有了上述理解，筆者將於下一章進一步闡述歷史社會學此一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興學派，並比較批判歷史社會學與其他歷史社會學之異同，指出前者的特殊之處。

¹¹³ *Ibid.*, pp.157-158.

¹¹⁴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

第三章 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

從上一章對 Andrew Linklater 的理論與研究之回顧中，我們發現歷史社會學面向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用來觀察當代國家體系中包容與排他的原則是否正在改變，並從中尋找出超越政治社群的普遍性道德基礎與目前實踐的程度。與此同時，我們也對其所謂「批判歷史社會學」有一大致掌握。Linklater 有意識地將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主流歷史社會學加以區隔。如前所述，主流歷史社會學關注社會、國家、地緣政治與戰爭的交互作用，而較少關注到德與文化力量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¹¹⁵Linklater 於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一般歷史社會學相比，至少有兩個重大不同：第一，其具有批判性內涵，目的在論證現存社會秩序中存有改變之潛能，並透過批判與反思將其釋放出來；第二，偏重於理念與制度層次，以理念與制度的改變與衝突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源。綜合二者可以發現，批判歷史社會學的取徑接近 Georg Hegel。

本章之宗旨即由探討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一般歷史社會學的不同之處出發，連帶闡述歷史社會學的內涵、關注焦點、多數研究者的取徑，以及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對話，進而指認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與批判歷史社會學的特殊之處。準此，本章將分為三節，第一節簡介歷史社會學的內涵及其與國際關係的對話；第二節將焦點放在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之發展；第三節進一步以此比較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一般社會學之不同；最後作結。

¹¹⁵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ransnational Harm,"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op. cit.*, p.179.

第一節 簡介歷史社會學

一、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在第一章中，筆者引用汪宏倫與 Theda Skocpol 對歷史社會學的定義，指出歷史社會學關注宏觀與大規模的歷史變遷，且試圖提出結構性的因果解釋¹¹⁶，應用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並且共享四個特徵：第一，關切具體時空脈絡中的社會結構與過程；第二，強調歷時之過程，在解釋結果時重視時間序列；第三，對有意義的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關連有所注意，且以之解釋個人生命或社會變遷中的意圖與非意圖後果；第四，強調某種特定社會結構或變遷模式的特殊性與變異性。¹¹⁷

根據上述判準，古典三大家—Émile Durkheim、Karl Marx 與 Max Weber 都可算「第一代」歷史社會學者。¹¹⁸然而社會學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卻與歷史學漸行漸遠，其逐漸分化的過程猶如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朝向學科分工發展的過程。1960 年代中後期，第二代歷史社會學者開始出現，其興起背景是反思與批判當時蔚為主流的結構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1970 年代末期，隨著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的展開，歷史社會學也開始被引入國際關係領域，與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對話。為什麼歷史社會學會與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對話？可以從兩方面解讀。一方面，從知識的發展脈絡觀察社會學，可發現其自始即具有強烈的「方法論之民族主義」傾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分析單位——社會——等同於民族國家，而忽略國際因素，或僅視之為「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¹¹⁹Anthony Giddens 更指出，與國際關係理論家相較，社會理論家多認為影響社會變遷的大多數重要因素皆來

¹¹⁶ 汪宏倫，〈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 年），頁 259-260。

¹¹⁷ 同前註，頁 2。

¹¹⁸ 汪宏倫，前引文，頁 2。

¹¹⁹ 汪宏倫，前引文，頁 259-260。

自於社會／民族國家內部，國際關係與社會學因而出現「不幸而又無法規避的分工」。¹²⁰此一「方法論的民族主義」有何缺失？舉例而言，Giddens 觀察到社會學事業中存在著一種怪異現象：軍事力量、備戰乃至於戰爭，對二十世紀社會世界的影響之大是無可否認的，但是目前社會學研究與教科書對於諸如家庭、階級與越軌等現代制度的討論極為豐富，有關軍事制度、軍事暴力和戰爭對現代社會之衝擊卻極為稀少；即便是相關社會理論的論文，也多聚焦於資本主義與工業主義等。¹²¹

另一方面，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因為受新現實主義影響太深，亦有所不足。John M. Hobson 指出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即新現實主義）的四個盲點：第一，缺乏一個國家理論，反而過分誇大結構對行動者的決定性影響力；第二，預設「國際」與「國內」的分析層次之區別，故無法理論化全球政治的整合本質；第三，假設國際體系為靜態，缺乏國際變遷的理論；第四，既然國際體系是靜態的，國際關係理論也因此帶有強烈的非歷史（ahistorical）取向。¹²²

Hobson 在隨後的論著中，進一步將前述批判精鍊成兩個詞彙：「年代拜物主義」（chronofetishism）和「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rism）。¹²³二者皆為非歷史主的一種形式，並將導致國際關係研究者產生四種幻象（illusion），亦即認定現在（狀）是靜止的、自然的、永恆的，以及與過去同質的。¹²⁴他並界定國際關係中的歷史社會學為「一種批判的途徑，該途徑拒絕把現在當做置身歷史之外的自主實體，而堅持將之鑲嵌於特定的

¹²⁰ Anthony Giddens 著，胡宗澤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頁32。

¹²¹ 同前註，頁24。

¹²² John M. Hobson 著，周劭彥譯，《國家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2003年），頁250。

¹²³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15.

¹²⁴ *Ibid.*

社會－時間位置 (socio-temporal place)，進而對前述非歷史主義的種種幻象提供社會學的補救」。¹²⁵

至於國際關係與歷史社會學產生對話——或曰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IHS)——之發展過程，根據 Hobson、George Lawson 與 Justin Rosenberg 的見解，可分為三波。第一波以 Skocpol、Charles Tilly、Michael Mann，以及 Giddens 等的著作為代表；乃從國際關係學門外發展起來，偏重於解釋社會變遷的國內過程，因此對國關學門的影響較小，且觀點與新現實主義親近。¹²⁶

對以新現實主義為首的主流國關理論之假設有所不滿的學者，則促成第二波 IHS 興起。這批學者包括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 Perry Anderson、Immanuel Wallerstein 與 Robert Brenner，以及沿用 Durkheim 分析方式的 John Ruggie。他們的共通點是注重對國際體系變化的解釋，認為國際體系在本體論上非既定，而是有形成的過程，且過程的結果亦非事先給定。¹²⁷

IHS 發展至此一階段，仍是由國際關係學門單方面借鑑歷史社會學的分析，國關學門對歷史社會學的影響微乎其微。對此感到不滿的學者於是觸發了第三波 IHS，試圖讓國關學門與歷史社會學的交流成為雙向；換言之，是國際關係學者投入更多心力，嘗試將「國際層面」的理論化。林炫向在此整理出三種具體操作方式，包括運用 Leon Trotsky 的「不平衡但合併的發只」(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之概念，從國際層面研究社會發展；探討東方文明對西方崛起之貢獻，以平衡「西方奇蹟」論述中的歐洲中心觀點；以及「事件式的國際歷史社會學」(Eventful IHS)，將分析對象由社會或文明之間的互動，轉為探討「歷史事件是如何造成社會形

¹²⁵ *Ibid.*, p.13.

¹²⁶ John M. Hobson, George Lawson, Justin Rosenberg, "Historical Sociology," (2013/08/23), <http://historicalsociology.files.wordpress.com/2011/08/hobson-john-george-lawson-and-justin-rosenberg-2010-historical-sociology-isa-compendium.pdf>.

¹²⁷ *Ibid.*

態的形成、再造、轉變以及消亡」。¹²⁸

二、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多元方法與研究標的

前述三波 IHS 有無共同特色？與其他後實證主義相仿，IHS 在定義與範圍上存在許多模糊之處。Hobson 便區分出七種歷史社會學流派，分別是：新韋伯學派（neo-Weberian）、建構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歷史社會學、後現代主義，以及結構現實主義的歷史社會學。這裡呈現出來的是國際關係學者援引歷史社會學資源時多元的取材與途徑，以及在本體論、認識論乃至於方法論上彼此不協調。以 Marx 與 Weber 為例，兩人皆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重要思想泉源，但國際關係學者在吸收、借鑑或揚棄兩者的思想與方法卻各自不同。¹²⁹國際關係中歷史社會學內部的差異，恐怕要比批判理論、建構主義等其他陣營都要來得大。

王軍與汪宏倫皆質疑，這種將所有帶歷史傾向的國際關係理論全部含括進來的寬鬆作法，會讓 IHS 這一新興領域失去其「獨特的理論傳承與指涉」，成爲一種「失去特徵的泛稱」。¹³⁰但是他們兩人都不認爲建立一個明確的學派是絕對必須且必然可欲的。王軍指出，如果賦予其過多的學術制度內涵，使其成爲封閉的知識共同體，則可能減損其知識上的豐富性，並讓學者在學科內從事故步自封的學術遊戲，因而不利於學科內與跨學科之間的對話與爭鳴。¹³¹汪宏倫也認爲，面對當前問題，有效理解並改變現存世界，才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務；而非汲汲營營於學科界線或知識系譜。

Linklater 所持的看法與上述兩位學者相同，他並指出歷史社會學之所

¹²⁸ 林炫向，〈春秋戰國至秦的「國際體系」變遷：Michael Mann 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應用〉（國科會計畫「近代早期歐洲與上古中國『國家』形成之比較研究」第一期研究成果，2013年），頁 7-8。

¹²⁹ 王軍，〈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基於流派的考察〉，《國際論壇》（2013/5/7 瀏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01/23/5031625_130934911.shtml。

¹³⁰ 汪宏倫，前引文，頁 262；王軍，前引文。

¹³¹ 王軍，前引文。

以會出現上述問題，肇因於其採取「大綜合」(grand synthesis)的研究途徑，所以在選材上必然帶有選擇性，且有過度簡化的風險。¹³²他歸納出三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途徑：第一，不同歷史年代或政治體系間的比較，如 Martin Wright 的國家間體系社會學；第二，關注過去數百年來現代世界發展，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即為一例；第三，考察全人類發展的歷史，採取此途徑者包括 Mann、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¹³³

回過頭來講，既然國際關係中歷史社會學的定義含混、內部存在極大分歧，定義一般，或曰主流的歷史社會學便有必要。所謂一般的歷史社會學，按照 Linklater 的看法，是在其分析觀點中以物質力量作為首要影響因素者。¹³⁴許多研究者以工業資本主義擴張與國家權力上升來解釋物質力量與生產體系的發展。在此分析架構下，地緣政治與戰爭對於社會與政治的影響，也是其重要的關注對象。這項途徑特別為 Weber 所強調，同時也受到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¹³⁵此處可以回到汪宏倫的論述，他將歷史社會學區分為「國際關係中的歷史社會學」與「社會學中的歷史社會學」兩種版本。¹³⁶「國際關係中的歷史社會學」指涉應用歷史社會學途徑研究的國際關係學者，前述 Hobson 已將之界定為一種批判的取徑，堅持將現在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時間位置，以彌補並修正國際理論內部種種非歷史主義幻象。這種將歷史社會學結合進一己之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作法，或可謂廣義的歷史社會學，Linklater 的研究想當然耳歸屬於此。相對地，「社會學中的歷史社會學」則是反過來從社會學領域向外延伸到國際分析層次，有著較強烈的學派意識與規劃，或可謂狹義的社會學。新韋伯學派歷史社

¹³² Andrew Linklater,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37.

¹³³ *Ibid.*, p.138.

¹³⁴ *Ibid.*, p.139.

¹³⁵ *Ibid.*, p.141.

¹³⁶ 汪宏倫，前引文，頁 262。

會學便屬於此一陣營，最主要的學者包含 Skocpol、Tilly、Mann 等。

新韋伯學派約出現於 1980 年代，其特徵包含：第一，重新探討 Weber 學說中對國家權力與現實政治的強調，凸顯其「衝突」而非「調和」之成分；第二，將國家「問題化」(problemize)，嘗試提出關於國家的理論，並擴展其分析框架，從單一民族國家到國際分析層次。¹³⁷對照上一節中 Hobson 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包括年代拜物主義與現時中心主義等，韋伯歷史社會學派是解決該等弊病的重要理論資源。而一旦將國家問題化，與國家生存息息相關的戰爭，與國家作為集體行動者所處之場域——國際社會，便成為研究國家起源與行為時所必須處理的議題。筆者將於下節處理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之發展。

第二節 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發展

一、社會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的國家論戰

國家向來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正由於國家對國際關係的演變具有重大影響，包括決定是否發動戰爭、是否開放市場與參與國際經濟遊戲規則，以及決定遵守國際環境保護規範的程度等。國家政策因而是最常被分析的議題，國家也成為各大國際關係學派的主要分析單元，包括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此一國家中心主義的 (state -centric) 預設立場，有兩層次之意涵：首先，是賦予國家優先於其他行為者之「主要行為者」(key actor) 地位；其次，是讓國家處於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¹³⁸

然而實際上，國家中心主義並沒有對國家本身有足夠關注，反而強調

¹³⁷ 汪宏倫，前引文，頁 263。

¹³⁸ David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C San Diego-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2013/5/6), <http://dss.ucsd.edu/~dlake/documents/LakeOxfordStateessayreview.pdf>.

結構的制約能力。根據 Ole Wæver 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在 1970 年代第三次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中，國家中心主義受到後實證主義陣營嚴格檢視與質疑，同時構成第三次辯論的主題之一，因其與國際關係的本質密切相關。如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基礎行為者，具備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或國家目標的工具理性；多元主義者主張國際體系中除國家外，尚存在許多次國家、跨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且在其觀點下，國家也被裂解為構成要素；馬克思主義者則跳脫出國家中心或多元中心的論辯，而以全球做為分析層次，並將資本主義世紀經濟（或生產關係與生產力量）與階級視為基礎行為者。¹³⁹

誠如筆者在上一節中引用 Hobson 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批判，國家理論貧乏的問題也因此凸顯。Fred Holliday 更於 1987 年直指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所以走入僵局，原因即在於國關理論本身對於國家概念的解析與理論性探究（theoretical inquiry）實在太少。在絕大多數國關理論中，國家被簡單地假定為由領土、人民、政府與主權所組成的單一完整實體。透過此一假定，國家被化約為國家領土整體（national territory totality）。¹⁴⁰

不過，根據林侑靜的研究，國關學界對國家理論的探究自 1987 年至今已有所進展；特別是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已經發現，全球化對於探討國家理論的變遷存在重大影響。因為在全球化下，現代西發里亞式的主權國家之內涵已產生變化，並發展出更多型態。Martin Shaw 的全球國家概念即為一例。¹⁴¹

相對於國際關係學界的國家論戰，在 1980 年代左右，社會學與比較

¹³⁹ Ole Wæver,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t al.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153.

¹⁴⁰ Fred Halli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16, No.2 (1987), p.217.

¹⁴¹ 林侑靜，《反思國際關係理論「國家中心論」之探討》（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頁 265。

政治經濟學界同樣出現一個平行的國家論戰。從 Skocpol 出版《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與編著《帶回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後，新韋伯學派挑戰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新韋伯學派主張國家擁有高度自主性並能主宰社會，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則堅持社會力量有其自主性之看法。Hobson 稱其為社會科學界的第一次國家論戰¹⁴²，並且認為此與國際關係學界中的國家論戰互補。

於是有一部分學者嘗試通過歷史社會學來解決此一問題。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在 1970 年代的交會，一方面使得國際關係理論掀起重返國家之浪潮；另一方面也促成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之發展。既然主流歷史社會學與 Linklater 皆重視國家理論，因此在下一節中，筆者將首先定位何謂主流歷史社會學，同時以 Hobson 提出的關於國家能動力的雙層架構，來定位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主流歷史社會學的理論，以期對兩者的內涵與差異有進一步了解。當這兩場平行的國家論戰交會，Hobson 認為有兩階段國家理論因而產生。第一波是由 Skocpol 與 Tilly 提出的國內社會與政治變遷之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波的代表人物為 Mann 與 Hobson，前者發展出多型態的 (polymorphous) 國家理論，後者更進一步邁向複合的 (complex) 國家理論，同時是非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社會學。¹⁴³

二、關於國家能動力的雙層分析架構

Hobson 在此發展出一種結合國際－國家－國內層次的研究國家角度，不同於過往基於「國家中心性」對抗「非國家中心性」(或抗社會中心性)的分析架構，或僅限於國家自主性對抗社會自主性之分析架構。¹⁴⁴國家與體系的關係，亦即能動者與結構的關係，究竟是能動者影響結構，還是結

¹⁴² John M. Hobson 著，周劭彥譯，《國家與國際關係》，頁 5。

¹⁴³ 同上註，第一、第六、第七章。

¹⁴⁴ 同上註，頁 8。

構影響能動者？Hobson 想要超越這種簡單二分法的分析。他認為必須對國家的能動力給予足夠重視，必須考量國家作為一個能動者（state-as-an-agent），是如何影響甚至形塑國際體系。¹⁴⁵

在國際－國家－國內的三層次架構下，國家的能動力亦分為兩個面向。首先是國家的「國內能動力」（domestic agential power），也就是一般理論者認為的「制度之國家自主性」（institutional state autonomy）；意謂「國家可不顧社會結構的制約或非國家行為者的利益，而制定內政與外交政策以及形塑國內領域的能力」。¹⁴⁶

與之相對的，則是國家的「國際能動力」（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意指「國家可以不顧國際社會結構的或非國家行為者的利益，而制定內政或外交政策與形塑國際領域之能力」。極端地說，高度的國際能動力意謂「國家具備緩和國際競爭邏輯之能力，並因此創造一個合作或和平的世界」。¹⁴⁷

根據這兩種能動力，Hobson 創造出如下圖之定位國際關係理論的架構。並以之定位五種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建構主義與（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其分析結果發現，各式國際關係理論下的國家，可以分為：缺乏國際能動性的被動適應型國家，包括現實主義、第一波（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與世界體系理論；具有中度國際能動力的國內適應型國家，包括激進建構主義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具有高度國際能動力的國內適應行國家，包括古典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具有高度國內與國際能動力的主動型國家，包括新自由制度主義與英國學派；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程度國內與國際能動力的「構成型」國家，包括古典

¹⁴⁵ 同上註，頁 7。

¹⁴⁶ 同上註，頁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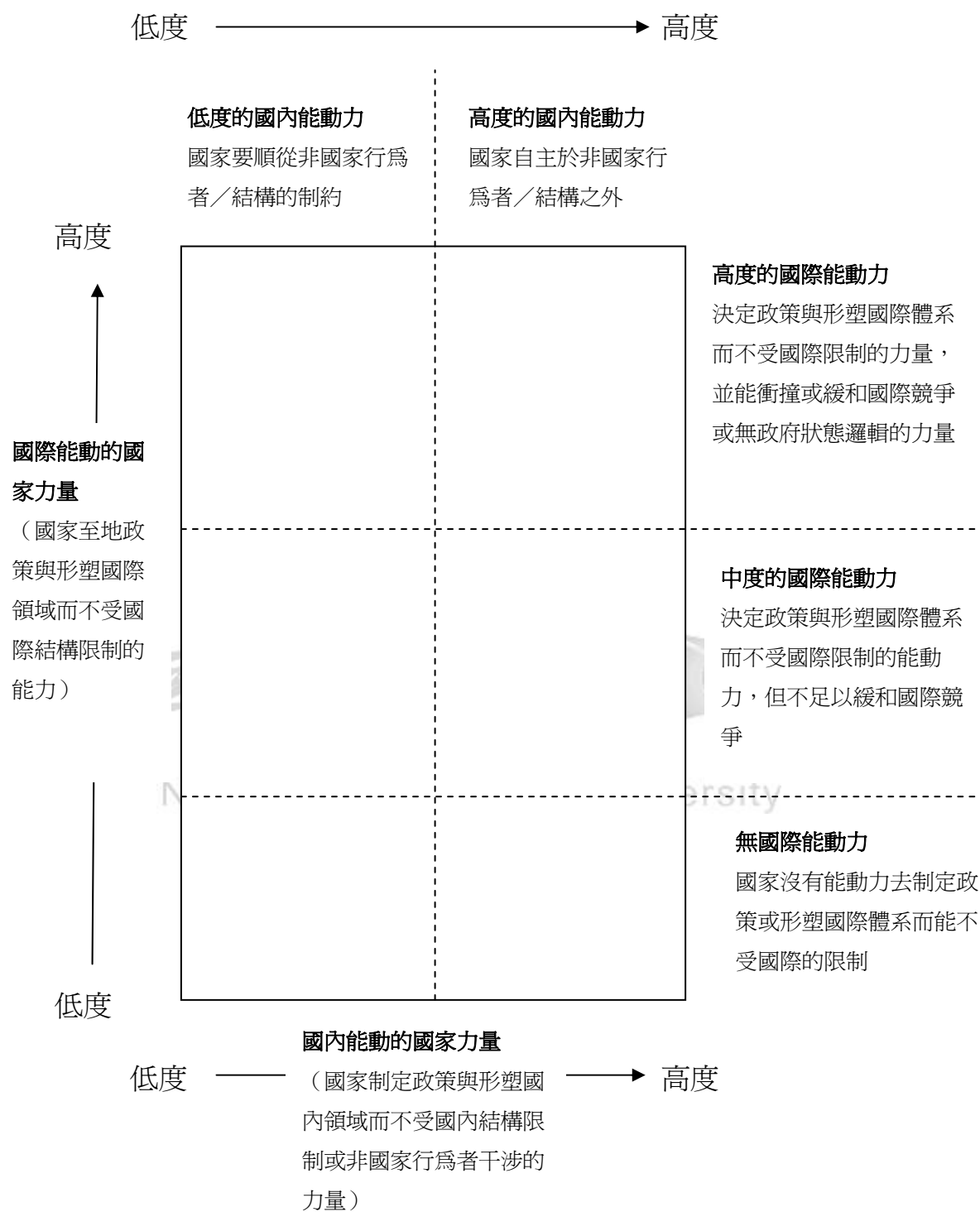
¹⁴⁷ 同上註，頁 11。

現實主義與第二波（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¹⁴⁸其中，第二波（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是最複雜的理論，被 Hobson 定位在所有途徑的邊界上，他也試圖架構出一個更為細緻，且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因為如果歷史社會學派重視國家，卻又不能提出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國家理論，其必將失去自己的立場。



¹⁴⁸ 同上註，頁 312-315。

圖 1 Hobson 定位國際關係理論的架構



資料來源：John M. Hobson。¹⁴⁹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理論是複合而非化約的，同時也是歷史社會學派在1990年代後發展的方向。其採取複合途徑的分析架構，不僅賦予國家在國

¹⁴⁹ 同上註，頁9。

內與國際的能動性回應來自這兩個層次的需求，「還會反過來利用不同領域以重新安排這些結構」¹⁵⁰。換言之，國際與全球領域在形塑國家與次國家領域之同時，亦被其所形塑，而且國際、全球與國內領域是「交雜的」（*impure*），在功能上以複合的方式交織在一塊，而非分離且自我構成的，故僅具部分自主性。¹⁵¹因此這項分析架構必須遵守以下六個原則，以提供完整的國際、國家與社會關係之理論¹⁵²：

- （一） 歷史與變遷
- （二） 多重因果（*multi-causality*）
- （三） 多重空間（*multi-spatiality*）
- （四） 部分自主性（*partial autonomy*）
- （五） 複合的變遷（*complex change*）
- （六） 非現實主義者的國家自主性

在分析完一般歷史社會學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關於國家的立場以後，便提供 Linklater 之批判歷史社會學相比較的基礎。筆者將於下節進行初步比較工作。

第三節 初步比較分析

Linklater 很早便注意到，國家理論的復興是 1970 年代以來社會與政治思想界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這與國家權力、國內經濟、社會義務、軍事科技、政治社會本質與國家（機器）自主性等議題有關。¹⁵³他在《政治社群

¹⁵⁰ 余家哲、李政鴻，〈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40 期（2009 年），頁 146。

¹⁵¹ John M. Hobson, "The Historical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2 (1998), pp.286-290.

¹⁵² *Ibid.*, pp.286-295.

¹⁵³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0.

的轉型》中，追蹤現代世界政治的形成過程中，不同邏輯與合理化過程的相互影響。當然，他最重視的是包容與排他的過程。根據他的分析，政治社群疆界的形成，亦即現代國家的出現，乃受到四種因素影響：第一，國家構建；第二，地緣政治競爭；第三，資本主義工業化；第四，道德實踐的學習。這四種合理化的過程產生五種壟斷性權力，民族國家強調渠等為不可分割與割讓的排他性權力：第一，在其領土範圍內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第二，在領土管轄內徵稅的絕對權利；第三，要求人民或社團效忠的權力；第四，人民或社團發生爭執時的裁判權力；以及第五，在國際法上成為唯一代表國家之主體的權力。¹⁵⁴現代國家將這些壟斷性權力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總體化計畫」(totalizing project)。使得國界、領域、公民權轉化為一體之三面，甚至把社會、經濟、法律與政治的功能通通集中在主權方面的治理，而排除朝其他方向發展之可能性。其結果是道德與政治社群疆界發生變化，而有人與公民、包容與排他的區分。

由上述可知，Linklater 希望將政治、經濟、理念等種種要素含括進其分析內。就此面向觀之，他應該會同意上一節 Hobson 等人提出的複合式的國家理論，尤其是國家與結構有能力建構彼此，否則主權國家與當代國家體系將沒有轉型或被超越的可能。但這些因素究竟如何交互作用，他未有明言或提出具體的分析架構。因為受 Georg Hegel 影響的他，將分析集中在理念與制度的改變與衝突，並以之作爲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源。根據其分析，人類自由的發展可由一系列愈來愈理性化的社會制度中尋得，亦即從部落社會一路進展到國家，最後甚至來到後西發里亞秩序。前述發展過程中的每一階段都具備相當程度之合理性，也都對提昇人類自由帶來貢獻，但也存在不足之處，從而必須往下一更合理的階段邁進。¹⁵⁵

¹⁵⁴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p.28-29.

¹⁵⁵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9.

林炫向與陳牧民認為，上述主張與 Chris Brown 所言「由血族而部落而城市而國家，最後進入『世界』」的線性發展模式相類，具有強烈的普遍主義與進步主義色彩。¹⁵⁶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Linklater 本人未必認為架構出一個完整的國家理論有其必要，這也標誌著他的理論與一般 IHS 的重要差異。

此外，在其分析中，社會學習是改變理念與制度，並使當前國際關係朝向世界政治發展的重心，但進行社會學習的行為者，究竟是個人、社會還是國家？還是三者兼而有之？如果是三者兼而有之，其能量有無大小之分？又應如何排序？這些問題將留待下一章進一步探索。

附帶一提，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社會建構主義也非常重視社會學習過程。社會主義者認為，物質性因素對國際社會的影響與限制，是經由互動與實踐，並透過行為者概念性的詮釋後才會發生作用。¹⁵⁷此一建構過程即社會學習過程。而 Linklater 強調之政治社群轉型的「轉型」，也是社會建構主義者所重視者。由是觀之，Linklater 的理論與社會建構主義或存在對話空間。

小結

本章首先討論歷史社會學的內涵暨其與國際關係產生對話的背景與內容，接著從國家理論的角度出發，探討歷史社會學派建立國家理論之努力，最後以此為基礎，對 Linklater 的批判歷史社會學，做出簡要的比較分析。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Linklater 之批判歷史社會學實際上距離主流歷史社會學甚遠，其問題恰好是缺乏與主流歷史社會學的對話。儘管他意圖

¹⁵⁶ 林炫向、陳牧民，〈國際關係規範理論〉，頁 195。

¹⁵⁷ 陳欣之，〈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收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頁 99。

賦予國家更重要的地位與更精密的分析，將國家戰略互動、地緣政治、文化、族群，乃至於性別等等通通含括進一個複雜的分析架構；他在追溯國家起源時雖然引用諸多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的文獻，包括 Mann 與 Tilly 等¹⁵⁸，但至今我們仍未能看到一個能夠將上述種種要素含括進來的分析架構誕生。這個分析架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既然在他的分析中，現代國家是因為這樣一個複雜、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過程而生，那麼現代國家今日的種種作為必將受其影響；如果不釐清那複雜、多重的力量，吾人將無法進一步分析國家此一政治社群可能的轉型過程。即使在他最新的兩篇論文中，他對於人類社會之發展與社群的建構，所採取的觀點依然是線性的，且聚焦於文化與道德的互動，甚少提及其他面向互動。筆者將於下一章進一步闡述這些論點。



¹⁵⁸ 同上註，頁 16。

第四章 案例研究－社群與傷害

對於 Andrew Linklater 而言，Immanuel Kant 的思想是為政治社群轉型之研究提供一個合適的出發點，因為他將社群問題放在世界歷史分析框架下，此一框架關心的是人性的歷史發展。Kant 研究社群問題之途徑，與 Karl Marx 的世界歷史主張有明確連結；亦即國家（nation）與世界國家（cosmopolis）間關係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的轉型。同時也與 Norbert Elias 有所連結，Elias 主張需要創造一種超越方法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因為其分析對象是不受控制的全球過程。上述三種途徑針對全球政治之現代性，都展現相同的歷史旨趣（interest）。他們三人的途徑都希望理解不同社會在全球經濟、政治、軍事與經濟過程中——社會對此都只有部分控制——的改變之長程模式。同時，他們也都想要了解全球化對於人性發展之影響與過程。¹⁵⁹

本章將根據第二與第三章的脈絡，用 Linklater 發展出的規範的、社會學的與實踐的三層次研究架構，探究他關注的兩個主題：政治社群的轉型與傷害問題。透過對這兩個主題的討論，筆者希望呈現其如何應用批判歷史社會學分析議題，並且指出他在批判歷史社會學上最新的變化與修正。換言之，社會學層次的分析依然是本章關注的焦點。本章將據此分為兩節，章末回頭檢視第三章提出來的國家能動性架構，並提出部分質疑。

¹⁵⁹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p.5.

第一節 政治社群的轉型

一、政治社群的意涵

在此，筆者將先簡要回顧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之內容，及其與政治社群的關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是以人類解放作為宗旨的理論。人類解放意指人遭受某種權力關係的壓迫與扭曲，只有去除這些外在限制，人的潛能才得以發揮，進而實現「美好且正義的生活」。¹⁶⁰至於「美好且正義的生活」其實質內涵為何，以及如何達成，便構成解放理論的核心內容。當前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學者，對解放的實質內涵與達成方式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啓蒙時代的哲學家特別強調，解放必須透過批判與反思各種外在事物和自我意識加以完成；Ken Booth 則側重在安全的確保上，因為沒有安全，人就不會有自主性與自由¹⁶¹；對 Linklater 而言，他希望達成的是一種「包容差異的普遍主義」。¹⁶²具體想法是以 Jürgen Habermas 的對話倫理(discursive ethics) 來創造一個沒有排他性的對話空間。至於如何落實到國際關係？重點是政治社群——尤其是主權國家——的轉型。因為當前妨礙人獲得更高自主性與自由的最主要限制，以及創造差異的最主要來源，皆源自於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

什麼是「社群」？Linklater 將其理解為「涉及包容與排他的體系」；是個體之間因為特定利益產生連結，進而構築成對彼此負有責任的關係。¹⁶³主權國家是人在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來的一種政治社群形式，並為當今影響世界政治的主要政治單元。他對於政治社群的看法深受 E. H. Carr 啓發。

¹⁶⁰ Mark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9.

¹⁶¹ 根據 Andrew Linklater，人的自主性意指人本身對所處環境的理性控制，這是人獲得自由的先決條件，而且人也具備這樣的潛能。見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35.

¹⁶² 林炫向、陳牧民，〈國際關係規範理論〉，頁 194。

¹⁶³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2.

Carr 在攻擊理想主義「天真」與「繁雜」(exuberance)的同時，也警告古典現實主義「荒蕪」(barrenness)與「內容貧乏」(sterility)。解決上述矛盾的方法，是提出一種國家政策，此政策的目標擴大道德義務的範圍，並擴大政治社群。¹⁶⁴因此可以這麼說：Linklater 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基本上等同於他對社群所做的分析研究，其目的為：第一，考察政治社群的形成與變遷過程，並分析種種不平等與宰制的由來；第二，思考重新建構政治社群以促進人類解放的各種可能形式暨其可能性。當然，這兩個問題可以放在 Linklater 之三層次研究架構下考察，但本章著重在社會學層次的分析。

第三章已述及在 Linklater 的分析中，現代國家是經由國家構建、地緣政治、生產與交換、文化與認同等要素的互動，最終統合於一個壟斷性權力(monopoly power)下的產物。¹⁶⁵此一「總體化計畫」(totalizing project)最終使道德與政治社群疆界發生變化，而有人與公民、包容與排他的區分。

166

在 Linklater 筆下，所謂現代國家指的便是歐洲國家。他指出歐洲國家在興起的過程中包含了一種「忠誠的革新」(a revolution in loyalties)，人民對內忠誠擴張，對外則縮減。對內，主權國家取代封建地主成為被效忠對象；對外，對於天主教與教宗之效忠也被主權國家取代。¹⁶⁷這種忠誠的變化其實就是公民身分的變化。按其分析，公民身分之概念亦為超越主權國家的動力來源。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人與公民》一書中，他便以公民身分之概念分析實現後西發里亞秩序的動力。他指出在部落社會中，人與

¹⁶⁴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 H. Carr,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23 p.337.

¹⁶⁵ Andrew Linklater,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Westphalian European State," in Daniele Archibugi et al. ed.,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¹⁶⁶ 洪鑣德，〈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頁 19-20。

¹⁶⁷ Andrew Linklater, *op. cit.*, p.119.

人之間的關係是基於血緣親族關係與習俗 (kinship)，而人在這樣的關係下自決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且所組成的社群排他性也很強。邁入國家階段後，血緣親族關係與習俗改由法律取代，「人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公民身分」之新概念也相應而生。此一新概念允許人們擁有更多自決能力，並縮減政治社群的排他性。換言之，現代國家之出現標誌著人的自我意識已進入更高階段。¹⁶⁸但是現代國家依然有其侷限，或謂「現代國家的弔詭」。誠如上述，現代國家一方面大幅強化其社會控制，另一方面卻又根除許多內部的不公正排他體制。¹⁶⁹此弔詭被 Linklater 認定是超越主權國家的動力來源，因為現代公民身分的概念蘊含「普遍主義合理性」(universal rationale)；為回應這樣的合理性，於是出現種種邁向「後排他性的國家」

(post-exclusionary states) 的運動。要言之，民族國家的排他性本質與現代公民身分概念的普遍性原則互相衝突，從而讓超越主權國家，乃至於國際社會朝向世界主義、經濟平等與尊重多元的方向發展成為可能。¹⁷⁰

至於超越主權國家以後的世界秩序將往何處發展？特別是主權國家乃現代西方歐洲之產物，其轉型又將如何擴及到世界其他區域？Linklater 提出三種可能性：第一，由國家所構成的多元社會 (a pluralist society of states)。在其內的政治社群由於在各自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上有著深刻分歧，並且反應在道德與文化上，故尊重彼此的自由平等與獨立性。第二，由國家所構成的社會團結主義式社會 (a solidarist society of society)。國家在此國際社會中，不僅就保障人權與少數族群權利等道德原則達成廣泛共識，同時也不再以各政治社群間能夠共存作為首要目標。第三，也是 Linklater 最嚮往的秩序——後西發里亞秩序。在此秩序下，國家進一步放棄許多主

¹⁶⁸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2.

¹⁶⁹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p.146-147.

¹⁷⁰ *Ibid.*, pp.164-165.

權權力，致力於建立更緊密的政治合作形式，以將共享的倫理規範整合進社會與政治結構中。¹⁷¹可是政治社群轉變的契機究竟何在？Linklater 認為全球化是一項重大關鍵。

二、政治社群轉型的契機：全球化

Richard Wyn Jones 曾在為文介紹法蘭克福學派之前，點出任何社會理論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其時代背景，但是這些理論也不能單純地化約為歷史與社會情境，因為具備能動性的人，存有反思（*reflexivity*）與創造的可能。¹⁷²以 Linklater 為例，所謂「新發展的關於人性之普遍性的信念」，實與全球化有著緊密關連。正因為全球化導致一體化（*integration*），本來受距離與地理條件限制而被區隔開來的人們，彼此之間的接觸方得以提昇，現代國家體系也才有朝向擴大包容範圍發展的進步可能。可是另一方面，Linklater 雖也注意到全球化會造成碎裂化（*fragmentation*），但是他樂觀地認為，碎裂化將有助於讓原先被主權國家消弭、壓制的少數、弱勢的文化、族群或種族，能夠重新獲得尊重並受到公正的待遇。¹⁷³言下之意，所謂擴大政治社群包容的範圍，不只是將國界外的外國人包容進來，同時也是將國界內被壓制的少數與弱勢群體包容進來。此即「包容差異的普遍主義」。

根據 Linklater 的看法，全球化、次區域組織與區域合作會侵蝕國家的壟斷性權力，人民「對國家的忠誠」轉移到「對全人類的忠誠」之可能性從而增加。¹⁷⁴晚近歐洲國家簽訂的《歐洲聯盟條約》中，第八條規定：「成員國的國民當為歐盟的公民。」此舉形同賦予歐盟成員國國民一個跨國政治社群的公民身分。¹⁷⁵此外，部分東歐國家在冷戰結束後產生嚴重的族群

¹⁷¹ *Ibid.*, pp.166-167, 191-193.

¹⁷²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p.9.

¹⁷³ Andrew Linklater,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Westphalian European State," p.114, 133.

¹⁷⁴ *Ibid.*, p.118.

¹⁷⁵ *Ibid.*, p.130.

衝突與分離運動。這也促使歐洲國家開始思考承認一個國家的主權，是否應以該國需尊重境內少數族群之權利為條件。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以及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都對此問題有所著墨；1992 年更在 OSCE 中設立「少數民族高級委員會」(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歐洲國家也通過《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並且以國際公約保障人權。¹⁷⁶凡此種種，皆顯示出歐洲國家在追求更具普遍主義傾向的跨國忠誠 (transnational loyalties) 之同時，也持續關注主權國家內的弱勢與少數族群；公民身分從原先對不關注差異 (difference-blind) 演變成複雜的觀念，能夠認知到特殊族群與少數種族之認同。而後西發里亞國家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調和不同政治忠誠、認同與權威。在現代世界這是無可避免的。Linklater 於是樂觀地結論，目前西歐國家已經匯集許多轉型的力量，朝後西發里亞國家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

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到 Linklater 對於現代國家起源的分析，集中在探討國家是如何形成一個對內弭平族群間差異、對外強調我群之分的政治社群。現代國家與由現代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乃是在國家構建、地緣政治競爭、生產關係、族群與文化等多重邏輯的作用下形成，並於二十世紀初期達到高峰。¹⁷⁷他接著將焦點擺放在從中找出政治社群轉型的潛能，並指出其與公民身分概念的衝突，將成為政治社群轉型的動力來源，全球化則是重要的觸媒。

¹⁷⁶ *Ibid.*, p.117.

¹⁷⁷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p.147-157.

三、比較 Linklater 與 Habermas 對於全球化的觀點

Linklater 的理論有相當程度取徑於 Habermas，特別是借用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來展望政治社群經由非扭曲的溝通轉型之部分。兩人在智識立場上亦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堅守大同主義立場、主張普遍道德規律的存在，並接納理性主義等。可是自 Linklater 於 1998 年完成 *TPC* 以來，他與 Habermas 似有漸行漸遠之趨勢，此一差異尤其表現在兩人對全球化的觀點上。

相對於 Linklater 提出的「後西發里亞秩序」，Habermas 也提出類似的「後民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其相關主張被收錄在以此為名的論文集。178 筆者將以此為起點，闡述 Habermas 對全球化的看法。Habermas 首先回顧 20 世紀的種種災難與教訓，並指出三種從戰後持續發展到 20 世紀 80 政治趨勢：軍備競賽、非殖民化、以西歐為首的社會福利國家。179 這三種趨勢中，唯有社會福利國家是被認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資本主義的固有問題，因而絕對地利大於弊。

然而，全球化的經濟格局終結了社會幅國家。富裕社會的經濟問題可以用世紀經濟體系的結構轉型加以解釋，也就是全球化；而全球化大縮民族國家作為行為者所享有的行動空間，使得保護主義與退回過往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政策這兩項政策手段不再可行，從而危及社會的民主穩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國範圍內的凱因斯主義」已失去意義。個別國家唯有投入國際競爭，推行靈活、積極且穩妥的政策，方能生存。於是，社會福利國家所依賴的歷史結構受到衝擊，也間接顯示像社會福利國家這樣的調節型國家 (regulating state)，唯有將社會福利職能由國家讓渡給超越國家的政治社群，並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國經濟發展需求，社會福利職能、

¹⁷⁸ Jü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譯，《後民族格局》(台北：聯經，2002 年)。

¹⁷⁹ 同上註，頁 60-62。

方有可能以目前水準繼續施行。¹⁸⁰

於是乎，人們開始關注跨國組織之設立。可是即便歐盟（EU）這樣懷抱偉大政治理想的組織，「充其量也只會由於其地域與經濟總量的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優勢，並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但絲毫改變不了經濟競爭的模式」。¹⁸¹換言之，如果說歐洲國家要聯合起來形成政治聯盟是非常困難之事，那麼要達成世界經濟秩序更是千難萬難。因為世界經濟秩序「不單純是指建立市場，並以法律加以制度化，還必須引入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意志，且全球化的市場流通也不能帶來預期外的社會副作用」。¹⁸²

以上論述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是 Linklater 理論中鮮有觸及的部份，顯示出 Habermas 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而比較重視實踐的分析，以及大同主義實踐的可能性。¹⁸³此外，Habermas 在討論中也時常探討國家如何應對全球化¹⁸⁴，這也是在 Linklater 的分析中鮮少出現者。

正因如此，Habermas 對全球化之於政治社群轉型的態度，不若 Linklater 那般樂觀。因為不是只有邁向更大的跨國政權，便是政治社群的轉型，資本主義邏輯下競爭的本質並未改變。Habermas 因此提出，要達成超越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其條件包括以各種方式提高全球範圍下的公民參與，提高跨國決策程序的透明與正當性；個別國家並且需原本狹隘的「國家利益」的視野，闊寬「全球治理」，其前提條件是國民本身的意識需提前朝此方面轉型，否則拓寬是也的努力斷不可能成功。Habermas 最後表示，目前全球都還沒有一個超越民族國家之樣板可供借鑑，他於是期許在建立

¹⁸⁰ 同上註，頁 65-68。

¹⁸¹ 同上註，頁 68。

¹⁸² 同上註，頁 69。

¹⁸³ 林炫向、陳牧民，前引文，頁 189

¹⁸⁴ 可參考 Jürgen Habermas 著、徐季耘譯，〈歐洲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化壓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年），頁 113-132。

一個歐洲社會的同時，應使之具備普世政治的意義。¹⁸⁵

當然，Habermas 對全球化影響的分析不只經濟層面，以科索沃事件為例，Linklater 因為看到人道干涉最新的發展而歡欣鼓舞，Habermas 注意到的反而是世界公民權機制仍處於薄弱狀態；在美國獨立維持國際秩序的現狀下，人權帶有強烈政治目的而非價值取向。而且，新興起的「第二世界」國家如比亞、伊拉克與塞爾維亞等，繼承了歐洲民族主義強權政治的遺產，不僅對內採取高壓，對外則擺出一副擴張的姿態。可見得從傳統的強權政治向世界公民型態過渡時，尚待解決的還有可能訴諸武力的現實衝突，這是相當艱鉅，且必須小心對待的過程。¹⁸⁶從 Habermas 的論述來看，他的觀點要比 Linklater 全面且務實。

筆者將在此先行打住，進入下一節關於傷害問題的探討。這是因為 Linklater 對傷害問題的探討，及其應用的研究途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延伸上述討論。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第二節 傷害研究

發表《政治社群的轉型：後西發里亞時代的倫理基礎》之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Linklater 在研究上的轉向。他開始處理與理性主義傳統／英國學派的對話，並將研究焦點放在傷害問題上。Linklater 研究傷害問題的文獻，大致散落在《英國學派與國際關係：一項當代的重新評價》(ESIR)、《批判理論與世界政治：公民資格、主權與人性》(CTWP)，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傷害議題：理論考察》(TPH) 三本著作中。目前只有閻靜¹⁸⁷與葉

¹⁸⁵ Jü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譯，《後民族格局》，頁 129-139。

¹⁸⁶ Jürgen Habermas, "Bestiality and Humanity: A War on the Border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Constellations*, Vol.6, No.3 (1999), pp.263-272.

¹⁸⁷ 閻靜，〈試析林克萊特批判歷史社會學視角中的世界主義傷害協議〉，頁 140-144。

宗顯¹⁸⁸對本議題有初步的介紹，且皆未引用前述 Linklater 最新的著作 *TPH*。由於他在這本書對傷害的概念與研究，均取得長足的進展，因此筆者將試圖在本節補上這些新的部分。

簡單來說，Linklater 對於傷害的研究架構可以分為三個彼此相連的部分：傷害協議（harm conventions）、批判歷史社會學與 Norbert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以及「國際好公民」（a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之概念。Linklater 思考的起點是人與萬物以及這個世界一樣，具備脆弱性（vulnerability）；但身為萬物之靈，人尚擁有獨一無二的創造力，並可用以傷害任何事物。因此當人們要組成一個社會，他們首先必須面對的便是傷害問題；不控制人去傷害他者，社會將無從組建，是故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傷害協議，或曰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也就是圍繞者「不傷害」（do no harm）的一套觀念、思想與原則。

隨則時局變遷，現代暴力工具與全球化所帶來的連動後果都需要被控制；人在世界範圍經濟力量下顯得脆弱，降低環境傷害的迫切性也正不斷提昇。因此傷害問題，及其背後的人／公民問題愈來愈重要。而主權國家的存在造成許多問題，因為當它們在保護自己的安全或其他利益時，將引導出武力的使用、殘忍與羞辱的行為、忽視、並危害以全人類作為平等道德存在的那些道德原則。¹⁸⁹

Linklater 賦予自身的任務，是探尋建立程度更高的世界主義式傷害協議（CHCs）的可能性，以及當前 CHCs 的發展程度。此處他特別強調同英國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對話。¹⁹⁰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系統性地比較歷史

¹⁸⁸ 葉宗顯，《普遍與殊異：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批判理論的初探與重建》，第四章。

¹⁸⁹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pp.1-12..

¹⁹⁰ 相關資料有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2)；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上不同社會的傷害原則彼此間的異同；從而探究國家體系的現代性其性質和潛能，以及目前現代性在 CHCs 發展上的重要進步。他並且借用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概念，來說明國家能動性對國際社會發展的影響。文明化過程指的是現代西方社會五百年來逐漸朝向和平發展，且成員間彼此的感情聯繫也日漸增長之過程。Linklater 希望將此過程擴大到全球範圍，也就是把國家自身有意識地創造且維持一個國際社會。在這樣的全球性政治社群中，對於傷害原則的尊重將進一步被制度化，全人類也被賦予表達他們對於傷害、脆弱性與苦難的關心和恐懼之權利。在簡單介紹 Linklater 對於傷害的研究架構後，以下將個別針對這三個部分進一步論述。

一、傷害協議

什麼是傷害？《牛津英文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中的說法是：指某人或某事物從事或所遭受到的「邪惡」(evil)，不管是生理上的或其他方式；其包括傷害 (hurt)、損傷 (injury)、損害 (damage) 和危害 (mischief)，並會導致悲痛、悲傷、疼痛、麻煩、不幸和苦惱等後果。¹⁹¹此一關於傷害的定義其核心為「邪惡」，Linklater 認為這是討論傷害觀念的合適起點。

前文已論及傷害協議之於每個社會的必要性，但是傷害協議的具體內涵究竟為何？Linklater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援引 Joel Feinberg 對傷害的定義，指出行為者的行為應只有在傷害到其他人的情形下被限制；亦即行為者行為的同時，必須考量可能加諸於他者的後果。¹⁹²應用到國際關係上，則追求控制行為者傷害的權力。¹⁹³接著，他分類出九種傷害形式，將之應用於國際政治則成為十種；並且主張區分傷害形式的同時，尚需評

¹⁹¹ Andrew Linklater,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2

¹⁹² *Ibid.*, pp.43-49.

¹⁹³ *Ibid.*, p.81.

估其相對的倫理重要性。因為我們在避免一種傷害的同時，一定會造成其他形式的傷害，所以必須有所取捨。以下為十種國際政治中的傷害形式：

- (一) 蓄意傷害，如征服、奴役、劫掠、在戰爭中違反人道法，以及排外；
- (二) 政府蓄意傷害自己的人民，如酷刑、侮辱與違反人道等；
- (三) 非國家行為者的蓄意傷害，如恐怖攻擊與跨國犯罪等；
- (四) 無心或未注意的傷害，通常與政府、企業與個人對環境的破壞有關；
- (五) 政府、企業或其他行為者的疏忽所導致的傷害，如進行核試爆之同時不顧及對當地居民會產生何後果的「核殖民主義」(nuclear colonialism)，以及出口有害產品到衛生與環境法規尚未完備之社會的「環境隔離」(environmental apartheid)；
- (六) 有權勢者對弱勢人民的剝削，而不能被歸類為對勞工剝削者，如性奴役，慰安婦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 (七) 特定組織陰謀傷害他者；
- (八) 應行為而未行為所產生的傷害；
- (九) 公共的國際傷害，在全球組織化程度較高的現代國際社會中，一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可以處理違反次要傷害協議¹⁹⁴的國家；
- (十) 由於全球化程度提昇所帶來的結構性傷害，即新馬克思主義理論。¹⁹⁵

¹⁹⁴ 這是源自 Barry Buzan 的首要與次要制度之概念。另外，公共傷害指破壞負責建立首要傷害協議的社會與政治制度。首要制度與次要制度的意涵可參考過子庸，〈英國學派發展之研究—探討其對國際社會、制度與研究方法之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30 期（2010 年），頁 150-151。

¹⁹⁵ Andrew Linklater, *op. cit.*, pp.61-73.

Linklater 並區別國際傷害協議（international harm conventions, IHCs）與 CHCs。IHCs 的目的在為國家間帶來秩序，以限制武力使用的方式為之，如尊重主權與不干涉原則。但即使 IHCs 並不等於使人免受各式各樣的苦難，其最終仍須被檢視對於世界秩序（world order）有何貢獻。世界秩序指所有個人皆享受免於不安全與暴力的自由此一狀態，CHCs 就是負責維持世界秩序者，如人道法與國際刑事法。CHCs 的地位在當代之所以重要，乃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interconnectedness）由於全球化而益加緊密，故跨國傷害的頻率、範圍與程度都越來越大。¹⁹⁶

筆者認為 Linklater 從社會的傷害協議類推到世界的傷害協議這樣的作法，很明顯是受到 Bull 對秩序問題之研究所啟發。我也認為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正如同 Bull 在他的巨作《無政府社會：對世界政治秩序的一項研究》（*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中，曾批判古典現實主義者類比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作法。古典現實主義者之所以作如上類比，是想藉此推論國際無政府狀態會阻礙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生成。Bull 指出該類比有三個不當之處：第一，現代國際體系不完全與 Thomas Hobbes 描述的自然狀態相同¹⁹⁷；第二，個人和團體之間，與國家之間的秩序是不同的；第三，以國際環境類比國內環境有其侷限，因為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¹⁹⁸當 Linklater 要把國內傷害協議推展到世界時，他同樣必須面對類比可能不當的問題。筆者認為他對此所提出的解答，便是現代性的發展使人彼此的聯繫（interconnectedness）受到加強。

¹⁹⁶ Linklater 在此援引的是 Bull 關於秩序與正義分野的概念，請見：Hedley Bull, *op. cit.*, pp.35-41。

¹⁹⁷ 因為現代國際體系並不具備 Hobbes 所謂自然狀態的三個特徵：第一，人將所有力量與創造力皆用於維護自身安全上；第二，缺少是非與財產權的觀念——每個人能獲得的東西，在他能保住的時期內便屬於他；第三，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

¹⁹⁸ Hedley Bull, *op. cit.*, pp.44-49.

二、應用文明化過程的批判歷史社會學

在講述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概念之前，或可先簡介其人。作為德國社會學家，Elias 早在 1939 年便出版其鉅著《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但直到他在 1970 年出版《什麼是社會學？》（*What is Sociology?*）之後，才名聲鵲起。世人之所以忽視他，與之所以重視他，都有其時空背景。1939 年的德國為納粹政權所把持，二戰爆發前夕，全歐洲看不到進步的可能。1970 年代的歐洲正好是學運、反權威等運動逐漸消退，而急於找尋新方向的時期。他的理論集中在權力、行為、情感與知識隨著時間推移，彼此間關係的發展。¹⁹⁹文明化過程與傷害問題關係密切，所有社會都會經歷文明化過程，因為所有社會都必須處理傷害問題——如何以不毀滅、挫敗、貶低他者的方式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求。Elias 並以歐洲為例，具體呈現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的文明化過程。²⁰⁰

Linklater 將文明化過程與英國學派的「文明程度」（levels of civility）概念相聯²⁰¹，筆者認為此與「國際社會由多元主義朝向團結主義邁進」的概念亦相關。歐洲的文明化過程發軔於法國，接著擴散到其他國家內部，而後彼此產生連結。Linklater 認為文明化過程可以放大到全球脈絡下，分析在不同國際體系下開展的文明化過程。²⁰²由於全世界人們彼此日益相互依賴，人們將更有動機與壓力去完成 CHCs。也就是說，現代性的發展使當代世界政治有完成 CHCs 的潛能存在。

Linklater 為什麼要於研究傷害議題時，採用歷史社會學的途徑？因為前已提及他希望將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理論，套用到全球脈絡下。Linklater 透過跨時與跨社會的分析，探討並比較各種道德與政治社群（如國家）內

¹⁹⁹ Elias 的論述內涵豐富，斷無可能於三言兩語間簡單交代完畢，若欲取得進一步的理解，可參閱 Norbert Elias 著，鄭義愷譯，《什麼是社會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²⁰⁰ Andrew Linklater,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pp.163-172.

²⁰¹ *Ibid.*, p.154.

²⁰² *Ibid.*, p.191.

部傷害協議，其視角世界主義的。在此處更可以看到，Linklater 的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受到 Wight 「國家間體系社會學」(sociology of states systems) 影響，其對 CHCs 的研究便是立基於此。²⁰³Wight 區別三種國際關係：世界社群（世界社會）／Kant、國家社會（國際社會）／Grotius，以及國家（國際體系）／Hobbes。²⁰⁴然後 Wight 提出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國家如何創造國家間秩序，以及不同的國際秩序達成世界主義式——考量個人正義而非國家間秩序——安排的程度為何。其對於 Linklater 傷害的社會學研究有兩點貢獻：第一，國家社會此一制度，正是為減少國家彼此傷害而生；第二，國家社會都會發展能促進國家間對話的制度，對話有助於減少傷害。至於冠以批判之名理由，乃是因為 Linklater 認為當前歷史社會學的主流研究仍聚焦於社會、國家、地緣政治和戰爭間的交互作用，對於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和文化力量缺乏足夠的關注。²⁰⁵修正這項缺失的方式，是通過對傷害協議進行跨社會與跨時的比較分析，連結歷史社會學與批判理論，可謂國家間體系社會學中的世界主義方法 (cosmopolitan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state-systems)。²⁰⁶他指出：

或許安全需求和道德、宗教顧慮之間的兩難，要解決還早，更或許永遠也解決不了。但即使暴力是人類歷史的中心，吾人以集體政治性方式控有組織群體間的武力之努力（而且可以追索到人類歷史最早之記錄）仍不應忽略。這就是為什麼要將社群問題定位在最廣範圍的歷史背景下之一個理由。將世界歷史、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用新連結連結起來之動機，在由於缺乏對不同國家體系創造世界主義傷害協議之程

²⁰³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ransnational Harm,"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 *op. cit.*, pp.164-168; Linklater 甚至對當今英國學派研究不大應用 Wight 的國家間體系社會學感到疑惑，見 Andrew Linklater,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pp.ix-x.

²⁰⁴ 括號內名稱為學界一般所熟知的分類方式，出自：Hedley Bull, *op. cit.*, pp.23-26。

²⁰⁵ *Ibid.*, p.179.

²⁰⁶ Andrew Linklater and He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0.

度做一系統性考察。進行此考察的目的，是為了解現代國家體系可能達成，或尚未達成的事務：克服仇外與群體自我主義，並理解外國人與本國人在道德地位上是相同的。²⁰⁷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Linklater 於 *TPC* 中，在社會學面向的分析上以 Habermas 的對話倫理與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以及 Nelson 對世界上文明與文明之間相互交往的研究兩者作為主要取徑對象，何以轉而重新強調 Wight 的國家間體系社會學，並新引入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這是因為一方面國家間體系社會學的核心，是針對各種由國家所組成的社會進行比較分析。且如前述，該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國家如何創造國家間秩序，以及不同的國際秩序達到世界主義式安排的程度為何。另一方面，Elias 對文明化過程的分析，同樣聚焦於長期社會模式的變遷。而不論在國際關係還是社會學領域，二戰以後這種長期、宏觀的分析方式都是少見的，卻剛好符合 Linklater 試圖從長期、宏觀的比較角度考察 CHCs 發展之程度的目標。他因此希望結合二者，讓（歷史）社會學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對話。

國家間體系社會學雖然提出了比較的視角，卻是沒有給予社會與社會間的政治社會變遷足夠重視，這是歷史社會學可以補救的地方；Elias 則沒有將文明化過程的分析應用在不同的國家間體系上，他更傾向認為國際關係中的文明化過程是稀少的。²⁰⁸對於 Linklater，結合二者的工作就好比超越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般，其目標便是發展出一個從普遍主義角度分析 CHCs 的架構。

²⁰⁷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p.4.

²⁰⁸ Andrew Linklater, *op. cit.*, pp.x-xi.

三、國際好公民

國際好公民與公民身分的觀念相關，當國家能夠在以追求己利為目標的同時，不以完全犧牲他國之利為手段，即為一國際好公民。此一概念預設國家有能力扮演媒介的角色，調和國家、國際和全體人類的利益。公民身分實際的內容在多元主義式、團結主義式或其他類型國際社會中會有所不同，反映到外交政策的實踐上亦有所差異。但無論前述公民身分的概念與實踐為何，Linklater 強調的是彼等背後隱含的共同主軸，即對於建立全球性政治社群的道德理想。於是公民身分與前述 CHCs 產生聯繫。

國際好公民的概念實際上來自於澳洲外交政策，更早的紀錄則出現在加拿大。²⁰⁹根據 Alison Pert 的觀察，過去二十年間，這項概念在澳洲外交政策上的比重忽上忽下；對於其真實意涵，各界也莫衷一是。Linklater 曾於澳洲 Monash 大學教書，並曾受邀參與撰寫有關澳洲外交政策之專書篇章。²¹⁰當時他寫的主題就是國際好公民。或許這可以說是 Linklater 學術生涯中唯一撰寫的一篇政策性文章也說不定。畢竟國際好公民的概念與其過往學術著作的邏輯有一定程度斷裂。過往他並未凸顯國家在國際上的能動性使得儘管他指出公民身分與政治社群在概念與制度上的衝突將成為政治社群轉型的動力；社會之間將依靠各種社會學習來調和普遍與差異；以及全球化將促使主權國家此一政治社群轉型等論述上，主權國家究竟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扮演什麼樣的角色？Linklater 始終沒有清楚說明。

國際好公民的概念提供吾人一個可能的觀察角度。他主張目前國際社會受到文明化過程影響，使得國家越來越重視傷害問題，而有意識地努力

²⁰⁹ Alison Pert, "The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of the Rudd Government,"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12/72(2012), p.1.

²¹⁰ Andrew Linklater, "What is A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in Paul Keal ed., *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2), pp.28-29.

創造並維持一個國際社會，這便是國際好公民。²¹¹不過話說回來，國際好公民的概念其實可以回溯到 Immanuel Kant 的世界公民權概念，Linklater 早在第一本著作 *MC* 中便曾詳談，筆者亦已於第二章述及。在此，他只是在此稍稍改變立場，凸顯國家的能動性而已。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 Linklater 要協助澳洲政府撰文，宣揚「國際好公民」之外交理念。

接下來，他分別探討戰略競爭導向的國際體系、多元主義式國際社會與團結主義式國際社會中，國際好公民身分的實際內容。如果國際關係是由戰略競爭導向的國際體系一路發展到團結主義式的國際社會，那麼在各階段中，國家對於傷害問題的重視程度透過國際好公民資格之實踐是逐漸增加的。²¹²甚至到最後，國際社會成員的身分將不再僅限於國家，而能容納非國家行為者與個人，主權則逐漸受普世人權制約。舉例而言，若某國境內發生嚴重違反人道之情勢，在團結主義式國際社會系，國家可經由聯合國之批准進行人道干預。在科索沃的案例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成員國之所以選干涉當地內戰，理由不只是因為想要阻止違反人道的罪行；更重要的是，該行為可能觸發未來「世界主義式的執法」（cosmopolitan law-enforcement）。儘管我們仍不確定這樣的改變會否成真，以及究竟何時會成真。²¹³

透過與英國學派的對話和對傷害議題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 Linklater 仍延續之前包容與排他的主軸，探討具普遍性的世界主義是如何具體呈現在不同的國際社會階段中，尤其是透過彼此的社會學習語文明化過程。傷害協議的發展程度，則體現出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已逐漸接近對於國家主權與利益的重視程度。換言之，普遍性的道德規範正逐漸超越具特殊性的主

²¹¹ Andrew Linklater and He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p.255.

²¹² *Ibid.*, pp.234-254.

²¹³ 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p.88.

權國家概念。

Linklater 自求學過程起，便浸淫在英國學派思想之中²¹⁴；其觀看國際關係的角度，是從 Wight 所謂國際關係中的三大傳統出發。而早在 *MC* 的後記中，Linklater 便已提到要應用 Wight 的國家間體系社會學來研究不同國家間體系內部關於權力、秩序與道德的競爭。²¹⁵因此，Linklater 的理論可謂本就與英國學派有深厚連結，只是早年他並沒有將論述焦點集中在此。儘管在 *BRM* 中，Linklater 表明其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是要通過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三者的對話與辯證來發展，但該書卻集中在現實主義與革命主義兩者的探討上。

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當時冷戰剛剛結束，在國際關係學界中，現實主義正作為被批判的箭靶，但是在社會學界中，傳統馬克思主義研究途徑反而受到實證主義挑戰。這兩種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讓 Linklater 意識到可由辯證而非完全對立角度來加以探索。²¹⁶也有可能單純是由於他學劃的研究架構相當龐大，因此儘管他很早便認識到英國學派的重要性，卻遲至 2000 年左右才有能力處理。筆者在此也想要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即對於傷害問題的研究，與英國學派有著理論的親近性，包括第一，傷害研究與 Bull 的秩序研究有著相似的方法。第二，根據 Bull 對社會生活秩序的定義——所有社會都努力保證人類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導致死亡或身體傷害的侵害、所有社會都努力確保信守諾言²¹⁷或履行已達成的協議，以及所有社會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財產所有權的穩定性。廣義的傷害協議與社會生活中的秩序亦可視為一體之兩面。

第三，英國學派試圖追尋介於現實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的中庸道路

²¹⁴ Shannon Brincat, "An Interview with Andrew Linklater," *Global Discourse* (2012/03/01), <http://global-discourse.com/contents/an-interview-with-andrew-linklater/>.

²¹⁵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5.

²¹⁶ 葉宗顯，前揭書，頁 99。

²¹⁷ Hedley Bull, *op. cit.*, p.4.

(*via media*)，而 Linklater 敏銳地從英國學派內部關於國際社會之多元主義 (pluralism) 與團結主義 (solidarism) 觀點的爭辯中，發現其中隱含的進步觀點。他指出英國學派的獨到之處，在於分析主權國家如何在國際社會這樣鬆散地結構下，以普遍道德與法律原則來達成共識，並學習控制暴力的傾向。²¹⁸既然主權國家具備這樣的能力，那麼透過社會學習進一步發展世界主義的道德與法律原則亦將成爲可能。也就是歸結到歷史社會學面向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學派非常強調歷史研究，Martin Wight 用他發展的國際間體系社會學來研究古希臘、中國的春秋戰國、中世紀的國際社會以及現代的國際秩序等²¹⁹；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 更回溯至西元前約 3500 年的蘇美人時代，來挑戰新現實主義有關國家體系的論點。²²⁰比較可惜的是，Linklater 雖然提出了宏大的歷史比較研究架構，卻未如上述學者實際進行大規模的比較研究。文明化過程的研究範圍終究僅限於西方歐洲，Linklater 的分析範圍沒有超出歐洲以外。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結

經過本章前兩節的分析與描述，可以發現 Linklater 對於國家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能動力，都採取模糊的立場。因爲首先必須定位的是，Linklater 認爲目前的國際關係屬於什麼樣的格局？從他表示「現代世界中的國家雖然對多元主義式的國際社會原則達成協議，然而它們卻未現出要建立團結程度更高之安排的慾望」²²¹看來，當前國際局勢在大部分領域上

²¹⁸ Andrew Linklater and He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p.121.

²¹⁹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5.

²²⁰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y Meet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5, No.3 (1994), pp.231-255.

²²¹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173.

屬於多元主義式國際社會，少部分領域——尤其是歐盟——則處於團結主義式國際社會，進而展望後西發里亞秩序邁進。如果說從多元主義、團結主義到後西發里亞國家的發展，是國家逐漸讓度出主權給普遍性道德，且非國家行為者與個人的參與逐漸增加；那麼在此過程中，國家的國際能動與國內能動力皆應當逐漸消退，成為缺乏國際能動性的被動適應性國家。因為在理想狀態下，彼此分立的國家將轉型成人類社群，並受普遍道德所支配。

可是根據前述 Linklater 的話語，國家顯然是（或至少是）推動政治社群轉型的一個重要行為者，如果國家不具備國際與國內的能動力，如何能夠推動轉型？又如何能夠影響且形塑國際與國內社會結構？如果 Linklater 否定國家的能動性，那他就無法自外於自己對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化約批判。追根究柢，筆者認為這是由於 Linklater 對於國家的論述，除了國際好公民的概念以外依然匱乏，導致對於轉型的「過程」與「實質」無法清楚說明。以 Habermas 為例，他同樣注意到全球化造成民族國家的式微，但他更進一步論述民族國家內部對於全球化的效果以及應如何應對之爭辯。²²²

Robert W. Cox 對於經濟全球化造成國家「國際化」的分析，也較 Linklater 來得深刻。他指出後冷戰時期，國家結構為適應全球化經濟，因此在主要國家引導之下走向「民主與市場改革」。市場改革使得國家撤銷對其控管，因而蓬勃發展。國家也為能讓國內經濟適應全球化經濟而調整，以限制國家的能力來達到新自由的全球經濟秩序，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國家於是成為一個中介角色，一方面宣傳並合法化新自由的全球經濟實踐，另一方面則讓進行扶貧與控制動亂以消弭來

²²² Jürgen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No.235 (1999), pp.45-69.

自全球化底層可能的反撲。²²³與上述 Cox 的分析相比較，更顯 Linklater 對於他所謂國家構建、地緣政治競爭、經濟與生產關係、文化與道德等方面分析之貧乏。筆者將於結論進一步闡述此一論點。



²²³ Robert W. Cox, "The Way Ahead: Toward a New Ontology of World Order,"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pp. 45–60.

第五章 結論：Linklater 究竟有無歷史社會學？

本文欲探討 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中歷史社會學的面向。Linklater 是國際關係理論後實證主義陣營中，寫作跨度最廣且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在 1970 年代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辯論的脈絡下，Linklater 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通過與各個理論流派的對話辯證與科際整合，試圖弭平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新現實主義之缺憾。在他規劃出來的包含規範的、社會學的與實踐的分析架構中，社會學層次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取徑於歷史社會學。他並發展出有別於一般歷史社會學的「批判歷史社會學」，聚焦於社會之間道德與文化力量的互動。

本文分成三個部分探討 Linklater 理論中的歷史社會學面向。首先，筆者在第二章簡介並定位其理論，凸顯其最初與最終的道德關懷，及與各式各樣理論對話辯證到建立三層次研究架構之過程。最後討論其理論與歷史社會學之關聯。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批判歷史社會學繼承 Immanuel Kant 與 Karl Marx 思想中社會學的面向，並同樣具有「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道德瑕疵能被消除之可能性」之解放特質。其具體研究方式，是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對於人與公民、普遍與特殊之間的關係，找出可作為改變現在世界之基礎的道德資源。而在發展批判歷史社會學此一研究途徑的過程中，Linklater 同樣是以不同理論與思想間彼此對話辯證的方式為之。

在第三章中，筆者試圖比較 Linklater 的批判歷史社會學與一般歷史社會學之異同。因此該章首先討論歷史社會學的內涵及其與國際關係產生對話的背景與內容。在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對話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歷史社會學對於國際關係的貢獻，在於將國家帶回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補足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國家概念的解析與理論性探究過少之問題。筆者接著援

引 John M. Hobson 建立的關於國家能動性之雙重架構，並由此架構比較批判歷史社會學、一般歷史社會學，以及其他主要國際關係論對於國家的定位與看法。

在第四章中，筆者延續二、三章的脈絡，考察 Linklater 如何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政治社群的轉型與傷害問題。社群是涉及包容與排他的體系，而作為今日世界上最主要的行為者——現代主權國家，是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出的一種政治社群形式。現代國家一方面弭平國內種種不平等，透過賦予轄下人民公民身分，將他們包容進來；但另一方面，則將轄外人民排除在外，造就「本國人／外國人」之分野。Linklater 嘗試尋找出超越此一分野的動力，並使政治社群轉型，朝向更大範圍的包容之方向邁進。在他的分析中，公民資格與政治社群概念的衝突，構成政治社群轉向更包容方向發展之動力，全球化則發揮類似觸媒的效果。

在傷害研究部分，Linklater 開始將重心擺放在與英國學派對話，而且將 Nobert Elias 的「過程社會學」(process sociology) 概念引入其批判歷史社會學的分析當中。Linklater 從人同時具備「脆弱性」(vulnerability) 與傷害任何事物的能力出發，指出所有社會在成立時所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便是如何避免傷害。因此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傷害協議，或謂傷害原則 (harm principle)。既如此，要建立全球範圍的社會，自然就必須有世界主義式傷害協議 (cosmopolitan harm conventions, CHCs) 存在。他於是致力於尋找建立更高水平的 CHCs 之可能性。他的具體研究途徑是整合 Martin Wight 的國家間體系社會學 (sociology of states-system) 與 Elias 的文明化過程 (civilizing process) 分析，去比較不同時空下，社會乃至於社會與社會之間的傷害協議彼此之異同。

然而經過這三部分的分析，筆者發現 Linklater 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除了

在國際好公民概念的論述上，有稍微觸及國家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能動性；但根本上缺乏一個歷史社會學的完整分析架構，以致於雖然指認出政治社群轉型或達成更高程度 CHCs 的動力來源，卻缺乏更強的說服力與對轉型「過程」的分析。筆者在上一章末尾處，已經舉出 Jürgen Habermas 與 Robert W. Cox 對於全球化的分析，尤其是全球化對於國家的影響，以及國家如回應全球化的部份，對照 Linklater 之於全球化的看法。可以發現 Linklater 當然也注意到國家內部人民在全球化下可能承擔的風險，但仍樂觀地將全球化帶來的一體化與碎裂化效果當做是侵蝕主權國家邊界的正向力量。問題是，「誰」來回應這些全球化產生的效果；「怎麼」回應；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Linklater 並未給予明確分析。

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兩個方向延伸上述討論。首先，Linklater 希望政治社群能夠朝向三重方向轉型：更尊重文化多元、對減少物質不平等有更強的承諾、並大力促進普遍性。²²⁴其中，儘管 Linklater 認知到分析經濟生活的本質是必要的，他卻（還）沒有這麼做。Roger D. Spegele 經過考察後指出，Linklater 事實上接受 Karl Marx 的觀點，預設物質稀缺可以被完全消除，進而主張分配正義。但這樣的分析明顯缺乏堅實基礎，從當今全球局勢看來，沒有人可以肯定物質稀缺能夠被完全消除，在下斷言前至少須先經過縝密研究。從這個角度出發，主權國家反而可能如 Cox 所分析那般，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襲時，保障國內人民自由的屏障。此與 Linklater 的看法無疑是相互矛盾的。他必須對全球化，尤其是經濟面向，帶給國家的影響，以及國家如何應對等部分給出分析。亦即 Linklater 有必要在歷史社會學的分析中，納入對物質、經濟與生產關係的分析，及其對規範層次問題——包容與排他——所產生的影響。受 2008 年金融海嘯、2012 年歐債

²²⁴ Roger D. Spegele, *Politic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p.64.

危機影響，即便是歐盟內部也出現許多雜音，一時之間「退出歐盟」或「保護／民族主義再起」等言論喧囂塵上。即便歐盟目前仍未遭遇真正崩解之危機，但這些事例在在點出對經濟與物質進行分析有其必要。

其次，Linklater 試圖透過歷史社會學的大規模比較分析來證明包容與排他理念之進展。但根據他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目前在國際關係上，關於包容與排他理念最進步的發展，產生在西方歐洲國家，尤其是歐盟。歐盟是如今世界上最符合團結主義式國際社會的區域。然而世界上其他區域有無可能朝向歐盟發展？抑或是歐盟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而難以複製？Linklater 需要就此進行分析，否則他無逃脫「西方中心」(Western-centric) 之指控。部分學者如 Giorgio Shani，已嘗試用其分析架構研究世界其他區域邁向後西發里亞秩序之可能，但所得到的結論卻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按照 Cox 的話與來說，是『為西方』說話且『為西方』而生」；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如果要嘗試解放非西方地區，並創造一個包容差異的國際社會，那麼「與非西方文化『更深入』接觸是必要的」。²²⁵顯然，要達成 Linklater 的理想，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這未必不符合 Linklater 的研究旨趣，他所提出的研究架構本就宏大，足供其他研究者據以進行研究，並經過對話與辯證的過程不斷精進之。

從另一方面來講，歐盟在形成的過程中，也並不完全擁抱普世理念。歐盟的前身成立於冷戰美蘇對立之格局下，且德法何解的意圖，主要也是不希望德國再度成為歐洲安全的威脅，因此可謂存在強烈的安全意涵與敵我意識之分。而透過歐盟之建構，也產生所謂歐洲化的過程，形成所謂歐洲認同。從土耳其至今仍被拒絕在歐盟大門之外，有意見指出歐盟的建立其實是立基於持續的排他實踐。不過，Else Kveinen 認為這並不會損害

²²⁵ Giorgio Shani, "Toeard a Post-Western IR: The *Umma*, *Khalsa Panth*, 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734.

Linklater 在規範論述上的邏輯，因為儘管不是全部，歐盟確實在某些面向上展露出後西發里亞的特質。但 Keivenen 仍點出，此一事實凸顯 Linklater 在觀念化後西發里亞社群上的潛在矛盾：Linklater 認為構成性標準（constitutive criteria）會彼此加強，但經驗分析結果卻非如此。這些分立的標準並不必然引導出對話溝通的需求。換言之，Linklater 在分析上過於強調制度性框架的影響力，必須加以修正。²²⁶

總結來講，Linklater 分析從反面凸顯出國家在政治社群轉型、全球傷害協議發展等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強調理念之於歷史社會學的重要性，確有其獨到之處，也未嘗不可彌補主流 IHS 過於著重物質而輕視理念要素的潛在缺失。然而，他自己也須提出更完整的分析架構，來描述國家與公民在國際體系下如何透過社會學習朝後西發里亞秩序，或其他國際秩序安排發展；以及國家與公民究竟如何應對全球化的一體化與碎裂化效果。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分析視野必須走出西方歐洲，去考察歐洲以外的地方理念與制度的發展過程。案例分析，尤其是針對歐洲以外的其他區域，將是探究 Linklater 理論的合適起點。或許這是 Linklater 留給後繼研究者的功課，筆者未能在本文中做到這點，是相當可惜的地方。

²²⁶ Else Keivenen, "Citizenship in a Post-Westphalian Community: Beyond External Exclusion?," p.32.

附件

附件一，Linklater 著作列表

出處	名稱	出版時間
專書	<i>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1990
	<i>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1990
	<i>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i>	1998
	<i>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i>	2006
	<i>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i>	2007
	<i>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i>	2011
專書 論文	“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5
	“Hegel,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
	“Towards a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ransnational Harm”	2002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Human Security”	2005
	“The English School”	2009
	“Marx and Marxism”	2009
	“Historical Sociology”	2009
期刊 論文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1992
	“Dialogue, Dialectic and Eman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Post-War Age”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1997

	Community: E. H. Carr,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volving Spher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1999
	“Transforming Political Community: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1999
	“Dialogic Politics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2005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2009
	“Global Civilizing Processes and the Ambiguities of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2010

附件二，相關歷史社會學著作

出處	作者	名稱	出版時間
專書	Martin Wight	<i>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i>	1991
	Stephen Hobden	<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i>	1998
	Norbert Elias	《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1998
	Stephen Hobeon and John M. Hobson	<i>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2002
	Hedley Bull	<i>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i>	2002
	Anthony Giddens	《民族-國家與暴力》	2002
	John M. Hobson	《國家與國際關係》	2003
	Kate Nash	《解讀當代政治社會學》	2007

	Theda Skocpol	《歷史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	2007
	Peter Evans et al.	《找回國家》	2009
專書 論文	Andrew Linklater	“Historical Sociology”	2005
	汪宏倫	〈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	2011

附件三，Habermas 針對全球化與歐盟的討論文獻

出處	作者	名稱	出版時間
專書	Jürgen Habermas	《後民族格局》	2002
專書 論文	Jürgen Habermas	〈歐洲是否需要一部憲法？〉	2004
	Jürgen Habermas	〈獸性與人性〉	2004
期刊 論文	Jürgen Habermas	〈歐洲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化壓力〉	1999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一) 書籍

Giddens, Anthony 著、胡宗澤等譯（2002），《民族－國家與暴力》。新北：左岸文化。

Habermas, Jürgen 著，曹衛東譯（2002），《後民族格局》。台北：聯經。

Hobson, John M. 著，周劭彥譯（2003），《國家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

Waltz, Kenneth 著，胡祖慶譯（1997），《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

王逸舟（1999），《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

白雲真、李開盛（2009），《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杭州：浙江人民。

倪世雄（2003），《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一) 專書論文

汪宏倫（2011），〈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林炫向、陳牧民（2011），〈國際關係規範理論〉，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陳欣之（2003），〈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

黃競涓（2007），〈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後實證主義學派〉，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

(二) 期刊論文

Habermas, Jürgen 著、徐季耘譯(1999),〈歐洲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化壓力〉,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4期,頁113-132。

余家哲、李政鴻(2009),〈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40期,頁127-152。

林炫向(2009),〈國際關係學與政治理論的重新結合:以羅爾斯的《萬民法》為鑑〉,《全球政治評論》,第28期,頁1-38。

洪鎌德(2009),〈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3期,頁1-30。

秦亞青(2006),〈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頁1-23。

陸昕、白雲真(2008),〈試論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以林克萊特的學術思想為個案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頁88-91。

過子庸(2010),〈英國學派發展之研究——探討其對國際社會、制度與研究方法之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30期,頁137-185。

黃旻華(2000),〈評「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1期,頁71-94。

莫大華(2003),〈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國際關係的另一次大辯論?〉,《政治科學論叢》,第19期,頁113-138。

莫大華(2007),〈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31期,頁175-216。

閻靜(2009),〈試析林克萊特批判歷史社會學視角中的世界主義傷害協議〉,《學術論壇》,第2期,頁140-144。

(三) 學位論文

林侑靜 (2008), 《反思國際關係理論「國家中心論」之探討》。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

郭懷舜 (2007), 《「威爾斯學派」之批判安全研究》。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旻華 (1998),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宗顯 (2009), 《普遍與殊異：Andrew Linklater 之國際批判理論的初探與重建》。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 國科會研究

林炫向 (2013), 《春秋戰國至秦的「國際體系」變遷：Michael Mann 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應用》。國科會計畫「近代早期歐洲與上古中國『國家』形成之比較研究」第一期研究成果。

(五) 網路資料

王軍 (2006), 〈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基於流派的考察〉, 《國際論壇》 (2013/5/7 瀏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01/23/5031625_130934911.shtml。

二、英文部分

(二) 書籍

Bull, Hedley (2002),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Brown, Chris (199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ochran, Molly (1999), *Normativ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ragmatic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rost, Mervyn (1996),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stitutive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s, Martin (1999),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Hobden, Stephen and Hobson, John M. ed.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lis, Martin and Smith, Steve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ngs, Kimberly (1999),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Rethinking Ethic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Linklater, Andrew (1990),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Linklater, Andrew (1990),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Linklater, Andrew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inklater, Andrew (2007),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London: Routledge.
- Linklater, Andrew (2011),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ufeld, Mark (1995),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ans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A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f Publisher.

Shapcott, Richard (2001), *Justice, Community, and Dialog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ganami, Hidemi and Linklater, Andrew (2006),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anna (1992), *Justice and Worl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New York: Routledge.

Wight, Martin (1991),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Wyn Jones, Richard (1999),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三) 專書論文

Bull, Hedley (1995),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ox, Robert W. (1996),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W. Cox et al. ed.,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vetak, Richard (2009),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evetak, Richard (2009), “Post-structural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bson, John M. (2002),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klater, Andrew (1992), "What is A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in Paul Keal ed., *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
- Linklater, Andrew (1995), "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Ken Booth &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inklater, Andrew and Macmillan, John (1995), "Introduction: Boundaries in Question," in Andrew Linklater and John Macmillan ed., *Boundaries in Question: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 Linklater, Andrew (1996), "Hegel,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an Clark and Iver B. Neumann ed.,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 Linklater, Andrew (2002), "Towards a 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ransnational Harm,"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klater, Andrew (2005),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Human Security," in Ken

- Booth 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inklater, Andrew (2009), "The English School,"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inklater, Andrew (2009), "Marx and Marx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inklater, Andrew (2009),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pegele, Roger D. (1996), "Emancipa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irst Cut," Roger D. Spegele, *Politic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æver, Ole (1996),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t al.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 Wight, Martin (1966),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Wyn Jones, Richard (2001), "Introduction: Locating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四) 期刊論文

- Bohman, James (2005), "We, Heirs of Enlightenment: Critical Theory, Democracy and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3, No.3, pp.353-377.
- Brown, Chris (1991), "Review Articl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21, pp.273-297.
- Brown, Chris (1994),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Anti-Foundational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3, No.2, pp.213-236.
- Buzan, Barry and Little, Richard (1994),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y Meet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5, No.3, pp.231-255.
- Duvall, Raymond and Varadarajan, Latha (2003), "On the Practical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No.2, pp.75-88.
- Elliott, Lorraine (2006),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al Harm Conventions," *Global Society*, Vol.20, No.3, pp.345-363.
- Habermas, Jürgen (1999), "Bestiality and Humanity: A War on the Border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Constellations*, Vol.6, No.3, pp.263-272.
- Habermas, Jürgen (1999),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No.235, pp.45-69.
- Halliday, Fred (1987),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16, No.2, pp.215-229.
- Hobson, John M. (1998), "The Historical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2, pp.284-320.
- Hoffman, Mark (1991) , “Restructuring, Reconstruction, Reinscription, Rarticulation: Four Voices i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2, p. 169-185.
- Hopf, Ted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pp.171-200.
- Jordaan, Eduard (2009), “Cosmopolitanism, Freedom and Indifference: A Levinasian View,” *Alternatives*, No.34, pp.83-106.
- Jones, Deniol (2003), “The Origins of Global City: Ethics and Morality in Contemporary Cosmopolitan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5, No.1, pp.50-73.
- Kveinen, Else (2002), “Citizenship in a Post-Westphalian Community: Beyond External Exclusion?,” *Citizenship Studies*, Vol.6, No.1, pp.21-35.
- Keohane, Robert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pp.379-396.
- Linklater, Andrew (1992),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1, No.1, pp.77-98.
- Linklater, Andrew (1994), “Dialogue, Dialectic and Eman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Post-War Ag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3, No.1, pp.119-131.
- Linklater, Andrew (1997),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 H. Carr,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3, No.3, pp.321-338.

- Linklater, Andrew (1999), "The Evolving Spher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 No.3, pp.473-482.
- Linklater, Andrew (1999), "Transforming Political Community: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pp.165-175.
- Linklater, Andrew (2005), "Dialogic Politics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31, pp.141-154.
- Linklater, Andrew (2009),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 No.3, pp.481-497.
- Linklater, Andrew (2010), "Global Civilizing Processes and the Ambiguities of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2, pp.155-178.
- Martins, Herminio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3, pp.217-240.
- Mason, Michael (2006), "Citizenship Entitlement beyond Borders? Identifying Mechanisms of Access and Redress for Affected Public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No.2, pp.283-303.
- Morrice, David (2000),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26, pp.233-251
- Pert, Alison (2012), "The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of the Rudd Government,"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12/72, pp.1-54.
- Saull, Richard (2002), "Transforming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Cas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Global Society*, Vol.16, No.3, pp.245-275.

- Shani, Giorgio (2007), "Relig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vincializing' Critical Theory: Islam, Sikh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 No.3, pp.417-433.
- Shani, Giorgio (2008), "Toward a Post-Western IR: The Umma, Khalsa Panth, 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10, pp.722-734.
- Shapcott, Richard (2002), "Cosmopolitan Conversations: Justice Dialogue and the Cosmopolitan Project," *Global Society*, Vol.16, No.3, pp.221-243.
- Walker, R. B. J. (1999), "Hierarchic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pp.154-156.
- Weber, Martin (2002), "Engaging Globaliza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Global Political Change," *Alternatives*, No.27, pp.301-325.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五) 網路資料

- Brincat, Shannon (2010), "An Interview with Andrew Linklater," *Global Discourse* (2012/03/01),
<http://global-discourse.com/contents/an-interview-with-andrew-linklater/>.
- Hobson, John M., Lawson, George, Rosenberg, Justin (2010), "Historical Sociology," (2013/08/23),
<http://historicalsociology.files.wordpress.com/2011/08/hobson-john-george-lawson-and-justin-rosenberg-2010-historical-sociology-isa-compendium.pdf>.
- Lake, David (2007),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C San Diego-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2013/5/6),

<http://dss.ucsd.edu/~dlake/documents/LakeOxfordStateessayreview.pdf>.

Yan, Jing (2010), "Interview Questions for Professor Linklate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2/04/15),

http://www.aber.ac.uk/en/media/cass_interview_for_professor_linklater.pdf.

f.

